

# 明清嘉興楞嚴寺《嘉興藏》之刊印 與其海內外流通

陳玉女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 中文摘要

明末清初嘉興楞嚴寺作為刊行流通方冊藏的重要處所，此為探討《嘉興藏》刊印起訖者所熟知。然何以選擇嘉興楞嚴寺擔任起刻藏發行之重責，近些年來，雖然海內外關心《嘉興藏》研究的學者逐漸加多，但對於嘉興楞嚴寺本身在方冊藏刊刻過程中所擔負的責任，及其寺院本身的人事變遷與《嘉興藏》刊刻、流通的關係，尚未被學界充分且深入的討論。而嘉興楞嚴寺於明清鼎革之際，及入清以來，漸成《嘉興藏》刊刻之重鎮，亦成為各地委以刻印佛經、語錄等佛書或遠來訪求極具板本威信的經書刻印流通處，最後又成為各地藏板集中收藏之地。縱非此處刻板，亦喜以嘉興楞嚴寺刊行之名附藏流通，為出刊經書增添價值並表彰其版本的具代表性。何以如此，其間的變化歷程與起伏轉折，更待詳實的究明。

《嘉興藏》流通之廣，見諸文獻記載，不僅在中國境內，東亞諸國猶然可見。過程中，無可諱言，嘉興楞嚴寺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然而

曾幾何時嘉興楞嚴寺在方冊藏暨佛書流通之角色逐漸褪色、消失，以至於一度讓人忘失其於明清佛教藏經史上的重要身影。這其間的輾轉演變為何，是進一步解明《嘉興藏》刊刻、流通之多元複雜層面的又一重要課題。因此本文希望以明清嘉興楞嚴寺方冊藏之流通營運的探討，作為理解並究明嘉興方冊刻藏之整體發展面向的一個補白。

**關鍵詞：** 明清、嘉興藏、楞嚴寺、經典流通、東亞



# The Publication of the Jiaxing Edition of the Buddhist Cano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its Domestic and Overseas Circulation

CHEN, Yuh-ne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Abstract

It is well-known by scholars that Lengyan Monastery in the city of Jiaxing had become a crucial place for issuing the Buddhist canon during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Although the Jiaxing canon has increasingly drawn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recently, several questions have not been answered: Why was Lengyan Monastery chosen for this undertaking? How did personnel changes influence the canon's publication and circulation? How did the monastery become a center not only for publication, but also for circulation, eventually becoming a repository for texts printed at other locations over a long period includ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The Jiaxing edition of the Buddhist canon was transmitted widely, not merely in mainland China, but also in other east Asian countries, with Lengyan Monastery playing a pivotal role in its publication and circulation. The present article explores the canon's circulation and the

operational details of its publication, in order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basic developments in the printing project.

**Keywords:** Ming-Qing, Jiaxing canon, Lengyan Monastery, Buddhist scripture circulation, East Asia



## 一、前言

明末清初嘉興楞嚴寺作為流通《嘉興藏》的重要處所，此為探討《嘉興藏》刊印起訖者所熟知。然何以選擇嘉興楞嚴寺擔任刻藏發行之重責，近些年來，雖然海內外關心《嘉興藏》研究的學者逐漸多起，<sup>1</sup>但對於嘉興楞嚴寺本身在方冊藏刊刻過程中所擔負的責任，及其寺院本身的人事變遷與《嘉興藏》刊刻、流通的關係，尚未被學界充分且深入的討論。而嘉興楞嚴寺於明清鼎革之際，及入清以來，漸成《嘉興藏》刊刻之重鎮，亦成為各地委以刻印佛經、語錄等佛書或遠來訪求極具板本威信的經書刻印流通處，最後又成為各地藏板集中收藏之地。縱非此處刻板，亦喜以嘉興楞嚴寺刊行之名附藏流通，為出刊經書增添價值並表彰其版本的具代表性。何以如此，其間的變化歷程與起伏轉折，更待詳實的究明。

而《嘉興藏》流通之廣，見諸文獻記載，不僅在中國境內，東亞諸國猶然可見。過程中，無可諱言，嘉興楞嚴寺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然而曾幾何時嘉興楞嚴寺在《嘉興藏》暨佛書流通之角色逐漸褪色、消失，以致於一度讓人忘失其於明清佛教藏經史上的重要身影，現今連寺院都不復存在。以它在明清佛教文化史上所曾經有過的影響，當今尚未有為其謀求重建的跡象，亦未見楞嚴寺志的留存或編纂。何以如此，是該寺

■

※ 收稿日期 2018.8.28，通過審稿日期 2018.10.30。

<sup>1</sup> 相關研究成果頗豐，已逐次於相關陳玉女，〈第四章 五臺嘉興藏刊刻緣起及其社會資源〉、〈第五章 江南嘉興藏刊刻各階段的社會資源與願求〉，《明代佛門內外僧俗交涉的場域》，臺北：稻鄉出版社，2010年。及陳玉女，〈明末清初嘉興藏刊刻與江南士族〉，《佛光學報》新4：2，2018年，頁301-371，中予以介紹列舉。此外，關於嘉興藏流通與經營問題，於謝馨后（釋法幢），〈第三章 刊刻與流通過程〉，《法寶流通：《徑山藏》的文獻價值與文化傳播影響》，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學位論文，2017年，有相對較為關鍵的文獻整理和討論，頁52-88。

文化使命的斷裂，或是該寺的傳承不濟所致，還是近代以來佛教發展的局勢逐令其光影消退。楞嚴寺因《嘉興藏》聞名於海內外，然楞嚴寺相關記載的獲得卻非想像中的容易，總要在《嘉興藏》刊刻與流通的人事要聞中求得散落其間的隻字片語。為了梳理楞嚴寺及其刊印流通《嘉興藏》之關係始末，本文藉由諸多文獻的蒐羅彙整外，並輔以田野採擷的資料，進行問題的探討。

筆者於 2017 年 7 月 15 日至 24 日前往南京金陵刻經處、蘇州西園寺、報國寺弘化社、杭州徑山寺寂照庵遺址、徑山腳下化城寺、杭州大學圖書館、杭州圖書館、嘉興新舊精嚴寺、楞嚴寺舊址等，進行《嘉興藏》刊本之調查與楞嚴寺舊址之探尋。其間，讓筆者感到興奮的是，在西園寺藏經閣中發現為數眾多的《徑山藏》刊本（記錄經目的手稿如是註明，《徑山藏》又稱《嘉興藏》）。<sup>2</sup>尚有未被收入新近出版的《嘉興藏》刊本之中，同時在蘇州報國寺看似廢置的玻璃櫥窗中，看見早年被報國寺借出的西園寺《徑山藏》數本，但破損腐化嚴重。這意謂著什麼？筆者審視這田野調查一路下來的觀察，深感時代動盪對於文化寶藏的無情摧殘。曾經是負責刊刻、板藏、流通《嘉興藏》的專門寺庵，多不復見，遑論《嘉興藏》刊本的留存。而所見留存之《嘉興藏》刊本，根據扉頁收藏章，有的購之於藏書樓，有的是捐贈，也有私人的單行本收藏，後被販售至書坊，再輾轉收錄在某些館藏之中。種種狀況不一而足，顯示《嘉興藏》在民間流傳途經的多樣化，它的複雜性與混雜性也因之產生。

《嘉興藏》在中國近代以來歷經無數人事的更迭與政局的變動，舉如遭受太平天國、清末民初戰亂的侵襲，及文化大革命的衝擊，寺院保存已屬不易，經藏的燒毀、流散與消失更不難想像。致使縱有《嘉興藏》散本留存的佛寺亦渾然不知自己的所有。因此如何借助這類的《嘉興藏》

■

<sup>2</sup> 感謝蘇州西園寺善擇法師和該寺圖書館樓曉蔚老師的大力協助。

刊本，及現今消失不存的楞嚴寺其舊址與其周邊的寺院和環境關係，對照文獻所述，思索或重建自明末以來，嘉興楞嚴寺在經藏流通上所面臨的種種和其間的輾轉演變與影響，進一步解明《嘉興藏》刊刻、流通之多元複雜的層面，是本文研究的重點。同時希望以此作為理解並究明《嘉興藏》刊刻之整體發展面向的一個補白。

## 二、嘉興楞嚴寺的重建、人事更迭與流通《嘉興藏》之使命

嘉興楞嚴寺，據嘉興人馮夢禎（1548-1605），萬曆 14 年（1586）〈楞嚴寺初建禪堂碑〉記：「秀水縣治之東北有梵剎曰楞嚴。宋長水子璿法師說楞嚴於此感天雨花之瑞故以名寺。」<sup>3</sup>萬曆《嘉興府志·寺觀》：「楞嚴寺在郡治西北二里。」<sup>4</sup>楞嚴寺之所在，萬曆《嘉興府志》未有圖繪，若借助光緒《嘉興府志》的圖示，可以清楚看到嘉興楞嚴寺的地理位置（見圖一），位在郡城西北人群往來頻繁而交通相對便利的城區。對佛經的印刷流通與販售，是不錯之選；有謂「嘉興乃平原水網地帶，便于發行流通。」<sup>5</sup>秀水人徐善（1634-1693）〈楞嚴寺經坊總論〉清楚揭示這一點，亦即紫柏達觀（1543-1603）等選擇嘉興楞嚴寺作為流通經書之地的考量，的確與城市交通之便有關。徐文載言：「開公以為流通宜擇五都之市，以便求者。」<sup>6</sup>又紫柏稱「方冊近褻，然購治易而流傳廣。捐小益大且可以重

■

<sup>3</sup> 明·馮夢禎，〈楞嚴寺初建禪堂碑〉，《快雪堂集》卷 8，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164，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頁 155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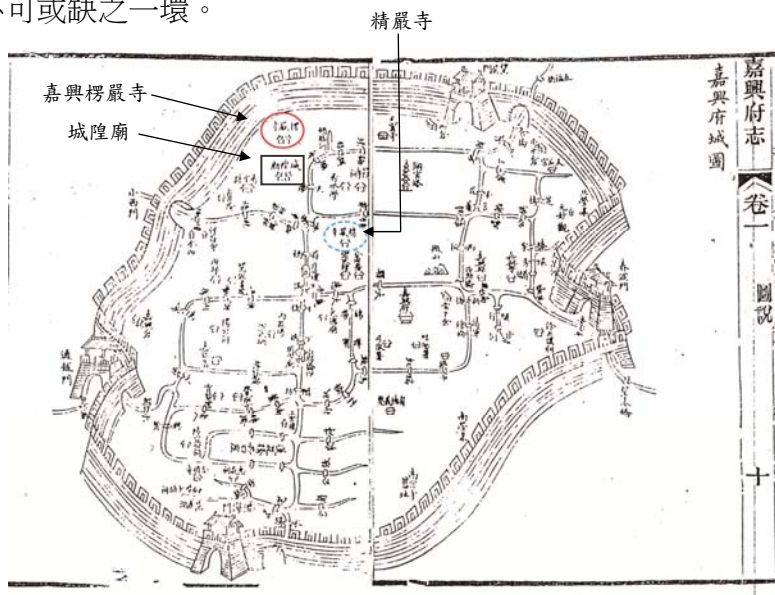
<sup>4</sup> 明·劉應鈞修，沈堯中等纂，〈寺觀〉，《嘉興府志》卷 4，據萬曆 28 年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年，頁 185。

<sup>5</sup> 陳心蓉，〈第二章 明代興盛的嘉興藏書〉，《嘉興藏書史》，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 年，頁 68。

<sup>6</sup> 清·袁國梓纂修，清·徐善，〈記·附楞嚴寺經坊總論〉，《康熙嘉興府志》卷 18，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冊 15，北京：中國書店，1992 年，頁 1083 下。

楞嚴也。」清楚了解嘉興楞嚴寺作為《嘉興藏》流通之所的深刻意義。

當然，選擇嘉興楞嚴寺作為刊印流通經藏之重鎮，除嘉興本身便利的水陸交通網絡外，嘉興地區名人士夫、仕紳雅士的輩出與捐助亦至關重要。筆者近些年來的研究亦陸續觸及此一相關問題。從五台山到江南徑山、嘉興楞嚴等區域，逐次探討該區域擔負刻藏所須之人力物力等資源系統。<sup>7</sup>因此，從城市的地理交通與商貿環境，思考嘉興楞嚴寺被選定為刊印流通《嘉興藏》的原由，亦是重要的觀察視角，是建構多元視角所不可或缺之一環。



圖一：嘉興楞嚴寺的位置<sup>8</sup>（圈圈標示處）

圓圈標示處：嘉興楞嚴寺；虛線圓圈標示處：精嚴寺；方框標示處：城隍廟

II

<sup>7</sup> 如註 1 所揭示，另可參考陳玉女，〈晚明羅教和佛教勢力的相依與對峙〉，以《五部六冊》和《嘉興藏》刊刻為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40，2011 年，頁 93-123。

<sup>8</sup> 清·許瑤光重輯，清·吳仰賢等纂，〈嘉興府城圖〉，《嘉興府志》卷 1，上海：上海書店，1993 年，頁 64。

嘉興楞嚴寺創立於宋代，幾經興廢，「洪武初僧善修復興。」<sup>9</sup>嘉靖年間遭受倭變、火災因而荒廢。馮夢禎的〈楞嚴寺初建禪堂碑〉，對於萬曆年間楞嚴寺興廢有著較詳細的記載。指出荒廢的楞嚴寺舊址，說道：

時巨室吳氏請佃為別業，朱樓碧樹照映城隅，外置小房以舍倡伎，數百年佛地一旦化為聲色之場矣。<sup>10</sup>

馮氏對楞嚴寺流為聲色場所的變貌，不免隱藏黯然神傷與苛責之情，故發此言。同時批評：「吳氏廢高臺傾曲池平，而般若之光息而復焰，豈非天哉。」<sup>11</sup>說是租借，但馮氏指摘為「巨室吳氏」所承租，將之變更為林園別墅，實為吳氏勢豪所侵占，如載：「郡城楞嚴寺久為勢豪割其半」；<sup>12</sup>朱彝尊（1629-1709）談起故鄉楞嚴寺時，亦稱：「至嘉靖間為勢家所占。」<sup>13</sup>值萬曆年間紫柏經過此地，見「尊酒嘯歌別是一番景象」，<sup>14</sup>豈能不傷感，遂「賦詩弔之，矢誓興復」。<sup>15</sup>

至於勢豪吳氏為何人？據載，紫柏經過吳氏別園即楞嚴舊址，興重建之志。馮夢禎寫到：

# ■

<sup>9</sup> 明·劉應鈞修，沈堯中等纂，〈寺觀〉，《嘉興府志》卷4，頁185。

<sup>10</sup> 明·馮夢禎，〈楞嚴寺初建禪堂碑〉，《快雪堂集》卷8，頁155下。

<sup>11</sup> 明·馮夢禎，〈楞嚴寺初建禪堂碑〉，《快雪堂集》卷8，頁155下。

<sup>12</sup> 明·沈季友編，〈紫柏大師真可傳〉，《樵李詩繫》卷32，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758上。

<sup>13</sup> 清·朱彝尊，〈真可〉，《明詩綜》卷9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1601。

<sup>14</sup> 明·劉應鈞修，沈堯中等纂，明·馮夢禎，〈楞嚴寺初建禪堂碑記〉，《嘉興府志》卷25，頁1623。

<sup>15</sup> 清·錢謙益，〈楞嚴志略序〉，《有學集》卷21，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139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199上。

無何寺址歸僧。時余哭先君子歸，預聞興復之議。而吳氏冢孫惟貞復推施址外地八畝，以廣般若之幅，豈非賢哉。<sup>16</sup>

此處所載吳惟貞乃嘉靖年間吏部尚書吳鵬（1500-1579）之孫，是馮夢禎友人。馮夢禎於萬曆 19 年（1591）〈序吳伯度刻閭書程交〉載明：吳「伯度名惟貞，太宰默泉先生之冢孫」。<sup>17</sup>默泉乃吳鵬之別號，載言：

吳鵬，字萬里，號默泉，秀水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歷福建參政。……累官至吏部尚書，致仕卒，年八十，有《飛鴻亭集》。<sup>18</sup>

吳惟貞為吳鵬之嫡長孫，出身官宦之家。故馮夢禎稱：「吳伯度生於貴侈」，但「不染世紛」。馮夢禎與吳惟貞（另有文獻寫成「維貞」）兩人有其共同嗜好，喜藏刻書，尤其馮氏是嘉興一帶的名藏書家。<sup>19</sup>兩人同好古籍文物之蒐藏，因此交好。對楞嚴寺舊址被吳氏承佃之事，馮夢禎一反前見萬曆 14 年（1586）撰寫〈楞嚴寺初建禪堂碑〉一文的批評語氣，讚嘆吳惟貞於紫柏倡議興復楞嚴寺時，追加布施「外地八畝，以廣般若之幅，豈非賢哉。」

馮夢禎態度之所以如此轉變，見其〈書楞嚴寺禪堂碑後〉一文，可清楚得知。其言：

予以丙戌正月為此記其敘興復因緣，語意過切，致設伯度施氏雅意，後得其詳頗悔之。而伯度不余病，相歡好至今，余為伯度所包容久矣。余謂伯度楞嚴殿工伊始，子能為功德主，余願易前記數語以報何如。伯度喜曰幸甚。蓋佃廢寺，雖世法之嘗，而于出

■

<sup>16</sup> 明·劉應鈞修，沈堯中等纂，明·馮夢禎，〈楞嚴寺初建禪堂碑記〉，《嘉興府志》卷 25，頁 1623。

<sup>17</sup> 明·馮夢禎，〈序吳伯度刻上書程交〉，《快雪堂集》卷 3，頁 73 下。

<sup>18</sup>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中央圖書館，1966 年，頁 256。

<sup>19</sup> 明·馮夢禎，〈序吳伯度刻閭書程交〉，《快雪堂集》卷 3，頁 73 上-73 下。

世因果之法為罪不細，惡報歷歷具在見中，故興復楞嚴亦為吳氏先人懺罪也。伯度識此，則金碧土木之役當不惜傾膏血先之，而余又何難易筆為方便門耶。維時丙申長夏伯度遣書秣陵官署，請于余曰如約。余亦曰如約。距立碑時一紀矣。伯度，維貞字也。<sup>20</sup>

「相歡好至今」應是重要的轉捩點，萬曆 14 年，即是前揭馮夢禎完成〈楞嚴寺初建禪堂碑〉的時間。馮氏認為當初自己「語意過切」，致使揣度吳惟貞捨地擴增楞嚴寺之美意，為此感到後悔，表示願意「易前記數語以報」吳惟貞對楞嚴寺興建工程的施予與贊助。而馮夢禎也必須為自己用詞的改變找出合理的說詞。故言吳惟貞深明其先人：「蓋佃廢寺，雖世法之嘗，而于出世因果之法為罪不細，惡報歷歷具在見中，故興復楞嚴亦為吳氏先人懺罪也。」總率先「不惜傾膏血」投注楞嚴寺建造土木工程。既然如此，馮夢禎自敘：「余又何難易筆為方便門耶。」

馮夢禎於萬曆 24 年（1596）「七月初三，陰雨間作，得吳伯度書，欲余易楞嚴禪堂記中數語」。<sup>21</sup>於是雙方如約履行。據上述「距立碑時一紀矣」，可推測收錄在萬曆《嘉興府志》的馮夢禎，〈楞嚴寺初建禪堂碑記〉，應是萬曆 26 年（1598）修改過數語的碑記。

楞嚴寺重興建工程之重責大任，紫柏則全權委由密藏道開負責，而工程所需金額，端賴陸光祖（1521-1597）與包檉芳（1534-1596）捐助「厚貲」，及諸善信的協力捐貲始得進行。興工於萬曆 12 年（1584）7 月，首建造禪堂及各堂室，完工於 13 年（1585）4 月，「規模爽塏，儼然千眾叢林」。然大殿未具，因所費頗鉅，為禪堂等建置之三倍，且受「奸民」阻撓，認為楞嚴寺興建工程有礙縣治風水，工程陷入停頓，長

■

<sup>20</sup> 明·馮夢禎，〈書楞嚴寺禪堂碑後〉，《快雪堂集》卷 30，頁 440 下。

<sup>21</sup> 明·馮夢禎，《快雪堂日記》，收入《稀見明史史籍輯存》，北京：線裝書局，2003 年，頁 163。據萬曆丙申七月初三條記載。

達二十年左右。<sup>22</sup>其間，負責興造大任的密藏道開因故隱遁，僧幻予接續大任。載云：

楞嚴復興僧堂先就，實惟太宰陸公之創始，與密藏開士之經營，月朔羯摩、晨昏功課，規程嚴肅鐘梵清和凡在見聞無不欽悅。……所惜者大殿未建，像設無寄。乃密藏上人遵遙峰而秘影，幻余上人自聖境而來儀，一顯一晦，一彼一此，豈非時節因緣使然歟。<sup>23</sup>

未久，僧幻余大約於萬曆 23 年（1595）或 24 年（1596）間離世，大殿興建仍然未就。馮夢禎於萬曆 29 年（1601）10 月的〈跋楞嚴造殿疏後〉寫著：

藏公初復楞嚴，先造僧堂安眾，謂大殿之工可剋日舉，竟徘徊紆阻垂二十年。此疏之作，余在南翰林，是時藏公已遠遯霞表，而幻余任事。今幻余遷化又五六年矣。<sup>24</sup>

之後，接續擔任楞嚴寺務的法師，為「楞嚴堂主茂竹公」。

憨山德清於萬曆 31 年（1603）冬 11 月口述紫柏因妖書罹難一案。憨山弟子釋福徵就此補述，紫柏生前倡刻《方冊藏》（又名《嘉興藏》）而重振嘉興楞嚴寺，及其期待楞嚴寺在《嘉興藏》刻藏中扮演出版流通的角色，以及重建過程中刻藏經營出現的人事問題。釋福徵疏曰：

嘉興郡中楞嚴寺，有書本經坊常住者。其刻藏緣起，在達師高足密藏公，奉慈聖太后旨，鳩工五臺。而究竟成就，則在徑山寂照、化城，及吾郡楞嚴般若堂兩地。當日達師法語，著為令，曰：徑

II

<sup>22</sup> 明·馮夢禎，〈楞嚴寺初建禪堂碑〉，《快雪堂集》卷 8，頁 155b-156a。

<sup>23</sup> 明·馮夢禎，〈嘉興楞嚴寺重建大殿疏〉，《快雪堂集》卷 26，頁 379b。

<sup>24</sup> 明·馮夢禎，〈跋楞嚴造殿疏後〉，《快雪堂集》卷 30，頁 435b。

山藏板，不得發經。楞嚴發經，不得藏板。似逆慮後來，他郡邑之妄有紛更者。<sup>25</sup>

紫柏定調，徑山寂照庵、化城寺專作經板藏所，而楞嚴寺則專行經藏刊印與販售流通，避免隨意更動，紊亂初衷。此事，康熙 20 年左右，徐善於〈楞嚴寺經坊總論〉寫著，釋道開「刺腕血書」紫柏囑咐十六字之令，即「徑山藏板，不許發經。楞嚴發經，不許藏板。今其書猶在寺也。」<sup>26</sup>

當「憨祖過嘉郡時，楞嚴堂主茂竹公，延齋於本寺，因請開示。」憨山開示內容，據釋福徵記述：

憨祖示語，歷敘楞嚴廢興，亦稱茂公端雅慈忍，而勉以大法，流通無窮不朽之佛事。因於坐間面囑徵云：我與達大師，法門心契，休戚相關。刻藏事，即我事。此未了念也，汝幸勿忘。嗣後移坊私印，紛更數番。<sup>27</sup>

可知《嘉興藏》刊刻，在紫柏離世後，其所定調三寺刻經藏板和刊行流通的職掌，即「經板貯雙徑寂炤（照）菴，刷印而裝訂、出請，俱在楞嚴」<sup>28</sup>的刻藏功能或角色分配，發生「嗣後移坊私印，紛更數番」的脫序狀況。

## II

<sup>25</sup> 明·釋德清撰，釋福善記錄，釋福徵述疏，《憨山老人年譜自敘實錄疏》卷下，萬曆三十一年癸卯冬十一月，收入《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22，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 年，頁 816 下-817 上。

<sup>26</sup> 清·袁國梓纂修，清·徐善，〈記·附楞嚴寺經坊總論〉，《康熙嘉興府志》卷 18，頁 1083 下。

<sup>27</sup> 明·釋德清撰，釋福善記錄，釋福徵述疏，《憨山老人年譜自敘實錄疏》卷下，萬曆三十一年癸卯冬十一月，頁 817 上。

<sup>28</sup> 清·朱茂時，清·朱茂暉合撰，〈楞嚴經坊重訂畫一緣起〉，收入《嘉興藏目錄》，據民國 9 年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 年，頁 23749。

楞嚴寺既以流通《嘉興藏》為其所以復興重建的重要任務，故前後擔任楞嚴寺寺務者，不管是道開、幻余或是接待憨山的「茂竹公」，除戮力於梵剎的興建外，無不以「刻藏事」為要。然「茂竹公」以楞嚴堂主居之，可見自萬曆 13 年楞嚴寺禪堂完成以來，大殿山門的建造仍懸宕未決，直到天啟 3 年（1623），即釋福徵所述，自天啟「癸亥歲，延江西宗派白法性琮住持楞嚴，稍有就緒。」但過程中，卻發生釋福徵所指摘的：「而化城僧清隱，復於丙寅、丁卯間，捏造變亂之說。」即徑山化城寺僧清隱，再次於天啟 6 年（1627）、7 年（1627）間企圖製造變亂之說，以撼動白法性琮的住持地位。可見刻藏事出現「移坊私印，紛更數番」的混亂現象，關鍵可能就在於一再發生「捏造變亂」的人事內鬨。由此浮現出徑山化城寺、寂照庵與嘉興楞嚴寺之人事對峙與矛盾的實像。儘管如此，最終「賴白公操履方正，經理精詳，不避嫌怨，終難動搖。」<sup>29</sup>

藍吉富指出，從「密藏道開撰發願文那一年（萬曆十五年丁亥，一五八七）」，至「順治十六年己亥（一六五九）」，期間歷經七十三年：

實際主持刻藏業務的人，有密藏（道開）、幻余（法本）、澹居（法鎧）、念雲（興勤）、按指（契穎）、徹微（印開）、以及掌理發行業務的白法（性琮）其人。<sup>30</sup>

而僧按指（契穎），參與刻藏事業，「與白法在楞嚴寺般若堂流通大藏的時間，大體是同時的。」依此推斷，「與白法二人可能是當時一主刊刻、一主裝訂與發行的兩位負責人。」<sup>31</sup>雙方駐錫的場域亦不同，僧按指應

<sup>29</sup> 明·釋德清撰，釋福善記錄，釋福徵述疏，《憨山老人年譜自敘實錄疏》卷下，萬曆三十一年癸卯冬十一月，頁 817 上。

<sup>30</sup> 藍吉富，〈《嘉興藏》研究〉，刊於《臺北版電子佛典集成》，「相關知識」欄，「五、刊刻經過及人事更迭」，<http://taipei3.cbeta.org/jiaxing.php>，2018/08/28。

<sup>31</sup> 藍吉富，〈《嘉興藏》研究〉，<http://taipei3.cbeta.org/jiaxing.php>，2018/08/28。

在徑山寂照庵主刻藏事，白法性琮則於楞嚴寺負責方冊藏流通事務。故以上幾位重要刻藏主事者，其分別擔任徑山寂照庵、化城寺或嘉興楞嚴寺等不同場域之刻藏責任，其場域之有別，應是研究嘉興刻藏者宜明確進行識別與梳理的問題。與此同時，不難想像徑山寂照庵、化城寺與嘉興楞嚴寺之主事者的人事派遣各有主張，雖同是負責刻藏事業，然意見之有別、互有參差，乃至對立矛盾發生。相關於此之文獻史料雖然有限，但本文希望亦能就此進行部分的釐清。

再回到嘉興楞嚴寺住持白法性琮的住寺任職來看，釋福徵對白法性琮在楞嚴寺三十餘年的經營及對刻藏事務的傾盡心力，給予極高評價。稱白法性琮自天啟 3 年（1623）擔任楞嚴寺住持：

迄今二十餘年，功在楞嚴，門殿像設，香積種種，圓就不小。而其莫大幹旋，尤在流通方冊，長聞人天眼目。九疑李先生，稱白公為紫栢肖子，密藏幹弟，不虛也。即乙酉（順治 2 年 1645）閏六月，兵燹大亂時，白公坐鎮經坊，鋒刃榜掠，劫之數四，屹然不動。直以頭目髓腦，捍衛竺乾墳典，得完璧如平時，佛力法力僧力，於茲大現奇特。今白公雖自楞嚴，而營泉，而漏澤，而東塔，杖笠所到，靡不鼎新整飭。而經坊一大事因緣，徵當從之始終，無負達慙諸祖遺念也。<sup>32</sup>

而釋滿益（1599-1655）述及自釋道開隱遁、紫柏大師圓寂後，楞嚴寺「佛殿經坊，漸至冷落」。至天啟 2 年（1622）「壬戌冬，禾城眾護法，敦請白翁，主禪堂事。俾山門廊廡，煥然一新。流通《大藏》，永成規畫。」<sup>33</sup>

■

<sup>32</sup> 明·釋德清撰，釋福善記錄，釋福徵述疏，《憨山老人年譜自敘實錄疏》卷下，萬曆三十一年癸卯冬十一月，頁 817 上。

<sup>33</sup> 明·釋滿益，〈白法老尊宿八秩壽序〉，《釋靈峰滿益大師宗論》卷 8，收入《徑山藏》冊 190，北京：國家圖書館，2016 年，頁 54 下。

上述，白法性琮任楞嚴寺住持時間雖有天啟 2 年冬與 3 年的小小誤差，但時間點確切應當在天啟 2 年末 3 年初。十年後，離開楞嚴寺。崇禎 16 年（1643），「逮癸未年，再蒞楞嚴堂，凡三載。時遇鼎革，兵戈沸騰，而師之慈心忍力益著。」<sup>34</sup>順治 2 年（1645）閏六月，清兵已攻下蘇杭一帶，雖是「兵燹大亂」之際，然嘉興楞嚴寺經坊，因白法性琮的坐鎮與捍衛，始得以保全經藏如平時。這意謂著嘉興楞嚴寺的刻藏未受清兵南下襲擊所擾亂。

錢謙益（1582-1664）的〈楞嚴志略序〉亦概述楞嚴寺興復與刻藏之大略如前。其言：

嘉定郡治中，梵剎相望，楞嚴講寺為最。有宋嘉祐至有明萬曆間，災燹薦仍，彝為甲第。紫柏大師可公賦詩弔之，矢誓興復。上足密藏開公親承囑付，克副弘願。入都城，請賜藏以鎮山門，又請繕刻方冊，流通淨場。於是乎像設莊嚴，鐘魚肅穆，琅函玉笈，湧現人間。楞嚴之勝，遂為方內冠。又二十餘年，白法琮公以耆年宿德，聿來住持。大殿山門，次第告成，經坊僧田，規制詳備。<sup>35</sup>

楞嚴寺經坊規制詳備於白法性琮住持任內。錢氏寫於順治乙未 12 年（1655）之〈白法長老八十壽序〉，亦述及紫柏囑託釋道開，興復「楞嚴寺為藏弃流通之所」。兩人相繼離世後，刻藏「大業中圯」，由江西信州白法性琮續挑大任，「仗緣藏事，行密而智圓，理通而事固，以精勤昭格人天，以精嚴軌範僧徒」，「五十年如一日也」。當清兵攻陷嘉興，楞嚴寺遭逢刀兵威脅時，白法性琮展現為法忘軀的精神，以生命保全法寶的勇氣，如前見釋福徵所言。序云：

■

<sup>34</sup> 明·釋滿益，〈白法老尊宿八秩壽序〉，《釋靈峰滿益大師宗論》卷 8，頁 55 上。

<sup>35</sup> 清·錢謙益，〈楞嚴志略序〉，《有學集》卷 21，頁 199 上。

酉戌之交，劫火焚如，經坊淨場，弓刀擊戛。公曰：「吾以身殉寺，以寺殉經，以經殉佛，如火於稻菴，不相舍離，焚則俱燼耳。」淨掃佛殿，洞開經廚，寶相琅函，光影見昱。擎爐炷香，佛聲浩浩，游騎隳突者，靡不瞪眙愕眙，回翔引去，經像保全，退居紫柏院。今年乙未，公世壽八十矣。<sup>36</sup>

按「今年乙未，公世壽八十矣」之語，白法性琮當生於萬曆3年（1575）。而釋蕩益亦極其讚賞白法性琮於《嘉興藏》刊刻、佛法流通所付出的心力。表示：

紫柏之以流通《大藏》為急務，誠不異刪《詩》、《書》、定《禮》、《樂》、贊《易》、修《春秋》之苦心也。密師契之，猶孔門有顏子。翁繼其任而擴充永遠之，猶孟子也，其功偉矣。<sup>37</sup>

並言：

今年已七十有七，長予廿三歲，而精神比予倍強，豈非續佛慧命所感之現果也？從茲《大藏》法燈，永永無盡，翁住世亦永永無盡。何異十六大阿羅漢，承佛敕命，擁護流通三藏法寶者哉。<sup>38</sup>

釋蕩益對白法性琮流通大藏之精神，推崇備至。據《金剛經如是解》卷末之白法性琮題記：

萬曆間，紫柏尊者以藏冊梵本繁重，難以流通。更於槁李楞嚴禪剎創置側理輕編，使佛祖慧命得緇白交參，其功並於日月。琮謬膺眾推，不揣棉力，擔荷此重寄者三十餘載於茲矣。……主般若堂八十三歲老僧性琮和南謹識。<sup>39</sup>

## II

<sup>36</sup> 清·錢謙益，〈白法長老八十壽序〉，《有學集》卷25，頁240下。

<sup>37</sup> 明·釋蕩益，〈白法老尊宿八秩壽序〉，《釋靈峰蕩益大師宗論》卷8，頁55下。

<sup>38</sup> 明·釋蕩益，〈白法老尊宿八秩壽序〉，《釋靈峰蕩益大師宗論》卷8，頁55下。

<sup>39</sup> 明·釋智旭述，《金剛經如是解·跋語》，收入《明版嘉興大藏經》冊19，頁77

白法性琮 83 歲，為順治 15 年（1658）。至此，其擔任楞嚴寺住持《嘉興藏》事務已長達三十多年。

縱然如前述，大多稱讚白法性琮住持楞嚴寺期間，已克服歷來諸多的困擾，使得刻藏制度粲然大備、營運順暢。但事實上，《嘉興藏》的刊印、流通與經營，似乎未如前述暢然無阻，從其他相關記載，得見反差之情。

據顯愚觀衡禪師（1579-1646）之〈刻方冊藏經目錄序〉所載，大約在崇禎末年，突然間有位出身貴州赤水的僧利根慶願肩負起刻藏所有未竟事宜。陳垣說：「方冊藏經第一次之完成，實成於黔僧利根慶。」<sup>40</sup>然藍吉富考證指出，此說非可信。<sup>41</sup>從目前可見相關文獻記載與研究，得以再次驗證藍吉富論斷的可靠性。《嘉興藏》正藏確切完刻於何時，隨著相關文獻的出爐，再再說明完刻於 1645 年利根慶負責刻藏任內實無此可能。<sup>42</sup>雖然如此，利根慶完成《嘉興藏》刊刻的此一說法所凸顯的意義，却值得深思。

顯愚禪師序言，《嘉興藏》刊刻，於萬曆 31 年（1603）「自紫柏老人去後，四方刻資歸聚亦微。」至崇禎 15 年（1642）將屆四十年，「梓未虛日，其事猶未竟。已刻者不及歸山，未刻者懈不速完。」突有利根慶，乃貴竹赤水人也，慨歎「紫柏老人未盡因緣」，一心挑起刻藏未竟之事。<sup>43</sup>自稱：「紫柏老人未盡之願，乃吾未盡之願。」誓言：「此身不

下。

<sup>40</sup> 陳垣〈藏經之遍布及僧徒撰述第七・黔僧與嘉興藏之關係〉，《明季滇黔佛教考》卷 2，收入陳垣著，陳智超主編，《陳垣全集》冊 18，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88。

<sup>41</sup> 藍吉富，〈《嘉興藏》研究〉，<http://taipei3.cbeta.org/jiaxing.php>，2018/8/28。

<sup>42</sup> 藍吉富，〈《嘉興藏》研究〉，<http://taipei3.cbeta.org/jiaxing.php>，2018/8/28。

<sup>43</sup> 清·釋正印重編，〈刻方冊藏經目錄序〉，《紫竹林顯愚衡和尚語錄》卷 7，收

竟此事願，此身碎為微塵耳」。顓愚禪師序稱：

策杖徧討徑山、嘉興、吳江、金壇諸處。已刻成者某某經律論、某某傳疏，記錄名目，卷帙、板數一一查明。未刻者亦如是查清。名目、板數多少，記於指掌心目之間。先之雲間，商之徐李黃諸大檀越，欣然就事。已刻者十之八九，未刻者十之一二耳。不期半載可完。<sup>44</sup>

顓愚禪師這樣的預估，與刻藏所經歷的諸多事實經驗相較，顯得過於樂觀。換句話說，未刻者，「不期半載可完」，應是顓愚禪師推測之語。據陳垣考證，「顓愚以順治三年卒，序當作於卒前一二年」，<sup>45</sup>相當於順治元年或二年，與利根慶涉入刻藏事務時間大約同時。而事後的發展，顓愚禪師並未再就此有任何記載，陳垣亦質疑：「利根所謂御製序，亦未知頒下否。」<sup>46</sup>而經板歸徑山統一處理，至嘉慶年間，仍是問題。故顓愚禪師此序可說是對利根慶參與嘉興刻藏的一種認知和期待，與事實的吻合度，存在相當距離。

利根慶從事刻藏大任的時間，應在順治即位、南明弘光元年（1645），如史載：「利上座欣聞新主登元，大興善事。上疏請旨，催四方已刻之板同歸徑山。復請御製序以光方冊藏經之首，此實脩延國祚，密助王化，一首善也。」<sup>47</sup>希望借助新登基於南京的弘光帝能詔令催促

入《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28，頁 695 下。

<sup>44</sup> 清·釋正印重編，〈刻方冊藏經目錄序〉，《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 7，頁 695 下。

<sup>45</sup> 陳垣，〈藏經之遍布及僧徒撰述第七·黔僧與嘉興藏之關係〉，《明季滇黔佛教考》卷 2，頁 90。

<sup>46</sup> 陳垣，〈藏經之遍布及僧徒撰述第七·黔僧與嘉興藏之關係〉，《明季滇黔佛教考》卷 2，頁 90。

<sup>47</sup> 清·釋正印重編，〈刻方冊藏經目錄序〉，《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 7，收入《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28，頁 695 下。

四方刻板送歸徑山，並為方冊藏寫序。僧利根乃馬士英（1591-1646）門僧，後轉獻給弘光帝，<sup>48</sup>故利根慶上疏訴求方冊刻藏事，其確切對象為弘光皇帝。誠如陳垣確言，顓愚禪師「序中所謂『新主』，弘光也。」<sup>49</sup>

利根慶參與刻藏時間，大約與僧按指（契穎）主持刻藏事務、白法性琮任楞嚴寺住持期間重疊。然而僧利根與按指、性琮之間的互動關係，截至目前尚未發現有任何相關的記載。雖然陳心蓉述及：「明崇禎末年（1644），嘉興楞嚴寺般若堂也刊刻藏經。協助性琮料理經坊的有黔僧繼庄（字利根）及憨山弟子福徵。」<sup>50</sup>此說並未佐以確切文獻，故難以證實利根與性琮的這層關係。據《黔詩紀略》三二載：「繼慶字利根，本名常慶，赤水衛指揮張大壯孫也。」明末遇賊亂家變，祝髮為僧，「更名繼慶」，事漢月禪師（1573-1635）為師，又「事密雲、雪嶠二師」。「遍歷天下名剎，與名士遊」。利根慶之所以參與方冊刻藏事，與其雲遊天下名剎，「與宗師大德接」相關。<sup>51</sup>至於所從事的具體工作，是否如顓愚禪師所言，即此時刻藏未竟紫柏老人刻事者有八，如下所示。

- （一）「四方之板未歸徑山」；
- （二）「板未完、未製方冊藏首序」；
- （三）「貯板之方構造未廣」；
- （四）「因板未完，板頭錢未總則定數」；

## II

<sup>48</sup> 清・南沙三，〈安宗皇帝〉，《南明野史》卷上，收入《中國野史集成》冊 35，成都：巴蜀書社，1993 年，頁 16 上、17 上。

<sup>49</sup> 陳垣，〈藏經之遍布及僧徒撰述第七・黔僧與嘉興藏之關係〉，《明季滇黔佛教考》卷 2，頁 90。

<sup>50</sup> 陳氏所言「黔僧繼庄」應是繼慶之誤。見陳心蓉，〈第二章 明代興盛的嘉興藏書〉，《嘉興藏書史》，頁 73。

<sup>51</sup> 陳垣，〈亂世與宗教信仰第十七・利根慶〉，《明季滇黔佛教考》卷 6，頁 263-264。

(五)「板頭錢預修貯板之室，未得良策，多有昌用」；

(六)「目錄依五時之次，其正譯、重譯，華梵傳述未盡其詳」；

(七)「搜括古今名集，遺漏未全」；

(八)「因板未完，勸者、施者、鳩工者未勒名於石，以昭千古。」

顓愚禪師列舉以上各項，「是紫柏老人所有當盡未盡之謀，而利上座一一能盡之。」<sup>52</sup>顓愚禪師雖誇讚利根慶對於紫柏刻藏未竟之志，「一一能盡之。」且利根慶似乎要完全取代前述僧按指刊刻和白法性琮流通《嘉興藏》的職責，完成刻藏大業。但事實上，顓愚禪師並未明確指出利根慶具體的刻藏作為，且「一一能盡之」，並不表示利根慶已逐一完成上述各項刻藏事務。誠如藍吉富所言：

在前引顓愚觀衡的序文中，像「不期半載可完。……上疏請旨，催四方已刻之板，同歸徑山。」這類語句，都顯示出事情正在做，但卻還未有結果。可見顓愚所撰的序文當係在認為「事情即將完成」的心態下撰寫的，並不是在「事情確已完成」之後所寫的文章。<sup>53</sup>

究竟利根慶投入刻藏的程度如何，並無進一步詳實的文獻可供參考。目前唯就幾則施刻牌記，端倪其參與刻藏所擔任的具體事務。史載：

孟蘭盆經疏，……慶與徐序東孝廉結弘法會。集諸宰官居士續梓方冊。三百卷目中，適此疏未鐫。李太僕捐資鏤板，余檢閱南北藏，文句不同。今依雲棲大師定本刻之。大師分科節目別出手眼，但南北較訛多不能書，謹跋數語，令觀者不獨識文句異同，或因

■

<sup>52</sup> 清·釋正印重編，〈刻方冊藏經目錄序〉，《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7，頁695下。

<sup>53</sup> 藍吉富，〈《嘉興藏》研究〉，<http://taipei3.cbeta.org/jiaxing.php>，2018/8/28。

指見月，得佛大孝報恩之旨，是所願矣。遇貴州赤水雪山沙門繼慶跋。<sup>54</sup>

利根慶與徐孝廉組織弘法會，集眾貲續刻方冊藏經。於三百卷目錄中，發現《孟蘭盆經疏》尚未刊刻，故著手鐫刻。利根慶則專務經文校訂工作，此疑是其投入刻藏事務的重要實踐項目。像崇禎 16 年(1643)刊本，有《十住毘婆沙論存十卷》、《菩提資糧六卷》、《佛地經論七卷》等施刻願文，均載：「崇禎癸未孟夏，松江弘法會貴州赤水釋繼慶較釋。」<sup>55</sup>而《十八空論一卷》、《文殊師利菩薩問菩提經論二卷》、《十二地論十二卷》、《三具足經優婆塞舍一卷》、《孟蘭盆經疏》等施刻願文，分別載有：「崇禎甲申仲冬，松江弘法會貴州赤水釋繼慶較識」、「崇禎甲申仲夏，松江弘法會貴州赤水釋繼慶較識」、「崇禎甲申孟夏，松江弘法會貴州赤水釋繼慶較識」，及「崇禎甲申孟夏，松江弘法會貴州赤水釋繼慶較識」等。<sup>56</sup>松江弘法會，是松江抱香庵弘法會，是《嘉興藏》諸多雕板地之一，<sup>57</sup>即是利根慶投入刻藏任事的場所。由此觀之，利根慶參與刻藏工作與顯愚禪師所稱其能逐一完成紫柏未竟之志，之間差距不小。

### 三、嘉興楞嚴寺「一寺二主」與後繼「漸不得人」衍生經藏流通障礙

崇禎、順治年間，即明清鼎革世亂之際，嘉興楞嚴寺經坊已逐次擔負起晚明時期寂照、化城二寺及各處刻經的實質工作。入清之後，可說

■

<sup>54</sup> 唐・釋宗密述，《佛說孟蘭盆經疏》卷下，收入《嘉興大藏經》冊 5，頁 650 下。

<sup>55</sup>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釋家類・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冊 4，臺北：國家圖書館，2000 年，頁 364、365、367。

<sup>56</sup>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釋家類・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冊 4，頁 365、366、367、368。

<sup>57</sup> 楊玉良，〈故宮博物院藏《嘉興藏》初探〉，《故宮博物院院刊》3，1997 年，頁 13-24。

大幅從事並取代他處刊印經藏的重責大任。據統計，楞嚴寺經坊或般若堂餘貲施刻的經卷達 897 卷，當中施刻於順、康二朝者有 529 卷，高達近 59.1%。相較於居士刊本，總計 6595 卷，其中施刻於順、康二朝有 528 卷，佔該類別的 8%。<sup>58</sup>可見入清以後，縱使居士仍行助刻，但嘉興楞嚴寺已挑起刻藏大樑，因此其人事更換與經營模式，更關係著方冊刻藏的進程與流通的順暢度。

前見此時刻藏所面臨的問題，除各地經板未能送歸徑山、刻板未完成外，楞嚴寺這邊，前見「移坊私印」或經價不一的紛擾，持續發生。順治 4 年（1647）朱茂時、朱茂暲<sup>59</sup>合撰，〈楞嚴經坊重訂畫一緣起〉，指出楞嚴《嘉興藏》，「向來出請刊有畫一」，<sup>60</sup>但近來因隨著時間的推移，物價上騰，經價很難不變動。故護持刻藏的檀越曾與白法性琮商議重新訂定統一經價。載云：

崇隆法寶，適際時移世異、物用變遷，印裝之工食滋增，紙值之涌騰倍屢，加以往來雙徑人力之勞、舟船之費迥別。囊時來請者但知從前畫一之定，不計目今物值之昂，仍則勢窘流通，停則壅於聖教。纔發動語言，較量便出，生彼此臯愆。用是我輩檀護，商於白法老人，議重酌訂畫一。炤（照）時值出請，對龍天而更定，矢不敢毫末妄增。<sup>61</sup>

■

<sup>58</sup> 拙稿，〈明末清初嘉興藏刊刻與江南士族〉，《佛光學報》新 4：2，頁 323。表一：「嘉興藏歷代各刊本施刻卷數」。

<sup>59</sup> 朱茂時、朱茂暲為堂兄弟，朱茂暲卒於順治 3 年（1646）。朱茂時（生卒年不詳），為朱國祚侄子朱大啟之子，朱彝尊的伯父，著有《咸春堂遺稿》。朱茂暲，朱彝尊的叔父。

<sup>60</sup> 清·朱茂時，清·朱茂暲合撰，〈楞嚴經坊重訂畫一緣起〉，《嘉興藏目錄》，頁 23749。

<sup>61</sup> 清·朱茂時，清·朱茂暲合撰，〈楞嚴經坊重訂畫一緣起〉，《嘉興藏目錄》，頁 23749-23750。

再對照順治 16 年（1659），欽差嘉湖兵巡道的「經直畫一」榜文，楞嚴寺經坊流通方冊藏，「當年原有編成目錄，刊定畫一價，每百紋銀參分。自順治四年紙貴，公訂每百六分。」而順治 4 年諸檀越與白法性琮商議的公定經價每百葉（頁）紋銀六分，恢復原來的議定。但「詎主僧不公議，私翻偽刻每百增至壹錢。」<sup>62</sup>未料寺院住持不按公家規定，私自翻刻提高經價至每百頁一錢。這裡的「主僧」指的應是楞嚴寺經坊負責刻藏事務的職事僧，而非白法性琮。按照徐善的說法：

順治初，以閩關梗阻，紙直騰貴倍價，每百六分。而奸僧射利緣為口實，又屢增至每百一錢二分。至順治十六年，片板不刻，所獲羨資俱充私橐。<sup>63</sup>

可見楞嚴寺經坊（般若堂）職事僧，仍無視住持白法性琮對於經價的議定。楞嚴寺般若堂職事僧與住持之間的扞格，至康熙 20 年前後依舊。實質上，楞嚴寺已陷入「一寺兩主」之困，故徐善感嘆「今遺意蕩然矣」。<sup>64</sup>也因此建議楞嚴寺經坊：

職事僧員宜定。經坊有三職事僧，曰坐櫃，以掌金錢；曰記籍，以掌書算；曰發經，以掌藏貯。此三職事者，不隸于住持，以絕扶同而嚴檢制。然仍謂之執事，而不曰般若堂住持者，惡一寺之有兩主也。<sup>65</sup>

■

<sup>62</sup> 無名氏編，〈欽差嘉湖兵巡道為懇定經直畫一以便流通藏經事〉，《嘉興藏目錄》，頁 23747。

<sup>63</sup> 清·袁國梓纂修，清·徐善，〈記·附楞嚴寺經坊總論〉，《康熙嘉興府志》卷 18，頁 1083 下。

<sup>64</sup> 清·袁國梓纂修，清·徐善，〈記·附楞嚴寺經坊總論〉，《康熙嘉興府志》卷 18，頁 1084 下。

<sup>65</sup> 清·袁國梓纂修，清·徐善，〈記·附楞嚴寺經坊總論〉，《康熙嘉興府志》卷 18，頁 1084 上-1084 下。

楞嚴寺經坊經價的混亂，及前述楞嚴寺寺僧「移坊私印」的亂象，包括寺內人事糾紛等，與一寺之有兩主的實質對峙狀況有關。因此即使是白法性琮任楞嚴寺住持，若般若堂職事僧不從其意，仍未能徹底根絕刻藏亂象，其受限於楞嚴寺經坊職事僧之杯葛，致令刻藏與流通事務處處見肘之情甚明。如所言：「十六年間，蠹侵本刊幾盡」，「而經直迄今未定。」<sup>66</sup>

經價的紛擾，讓請經者無所適從，不借官方之力，甚難有效予以導正。誠如榜文所記，長期支持刻藏的馮氏家族，即馮夢禎之子馮去邪<sup>67</sup>及嚴大參<sup>68</sup>，建議官憲進行經價改革。榜曰：

今據馮生去邪平議，折實紋銀捌分陸厘。復有嚴生大參擬減柒分，多寡不倫，眾莫適從，非奉批定，眾口難齊，紛紛何已。伏乞從中酌斷給示，著偽造畫一禁革，速刊新本備查。各經紙數准憲批算定，永遠遵行等情，據此為照。榜示經坊流行方冊，原欲其疏通，近因寺僧射利私增畫一，以致寶藏停滯。<sup>69</sup>

「寺僧射利私增畫一」是混亂市場經價、延宕刻藏流通的要因。故嘉湖兵巡道特別出示榜文，「示諭楞嚴寺住持、執事暨四方請藏各眾僧人等知悉。嗣後經坊方冊每一百葉定價紋銀捌分，永以為例，不許低昂價值，

■

<sup>66</sup> 無名氏編，〈欽差嘉湖兵巡道為懇定經直畫一以便流通藏經事〉，《嘉興藏目錄》，頁 23747。

<sup>67</sup> 清·錢謙益，〈南京國子監祭酒馮公墓志銘〉，《牧齋初學集》卷 51，收入《四庫禁燬叢刊·集部》冊 114，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頁 598 下。載：馮夢禎（秀水人）「卒於萬曆乙巳十月廿二日，享年五千有八。子三人，驥子、鶴雛、去邪，葬公於西溪之梅塢。」

<sup>68</sup> 嚴大參（1590-1671），為輓轅居士、輓轅道人，為費隱通容禪師（1593-1661）法嗣。

<sup>69</sup> 無名氏編，〈欽差嘉湖兵巡道為懇定經直畫一以便流通藏經事〉，《嘉興藏目錄》，頁 23747。

以致叢弊作奸。」<sup>70</sup>此時楞嚴寺「新住持為淨心、執事煥如、不羣、如念等，俱即實心任事，流通經藏。」<sup>71</sup>

據此得知，順治 16 年，接續白法性琮擔任楞嚴寺住持的是僧淨心，經藏流通的執事僧有僧煥如、不羣、如念等。官方希望楞嚴寺僧能夠實心辦理方冊藏流通事宜，經價核定「每一百葉定價紋銀捌分，永以為例」。但事實上，嗣後仍未如實施行。其間的轉折歷程，參照徐善的〈楞嚴寺經坊總論〉，可獲得更清晰的補充。

徐善對於紫柏訂定寂照、化城和楞嚴三寺各自負責的刻藏任務之後，指出：「厥後相繼護持者，有司寇朱公、司業譚公定為例，每經百葉受值三分。」與前見順治 16 年欽差嘉湖兵巡道的「經直畫一」榜文所言吻合。同時規範：

除紙本及刷印裝潢之費，所獲贏羨纖悉用以刻經。其寂照、化城藏板之所，十部抽一，以給典守者之食。相沿久之，罔敢或渝。<sup>72</sup>

但此規制若真「相沿久之，罔敢或渝」，則「佛殿經坊，漸至冷落」或「移坊私印，紛更數番」的乖離現象不致於產生，以至於影響刻藏進程。徐善稱順治 2 年「乙酉鼎革，主席者為白法性琮，忘軀扞衛，幸無恙。自後漸不得人。」<sup>73</sup>認為楞嚴寺《嘉興藏》刊印與流通事業受阻，自白法性琮之後，「漸不得人」乃至為關鍵。

■

<sup>70</sup> 無名氏編，〈欽差嘉湖兵巡道為懇定經直畫一以便流通藏經事〉，《嘉興藏目錄》，頁 23747。

<sup>71</sup> 無名氏編，〈欽差嘉湖兵巡道為懇定經直畫一以便流通藏經事〉，《嘉興藏目錄》，頁 23747。

<sup>72</sup> 清·袁國梓纂修，清·徐善，〈記·附楞嚴寺經坊總論〉，《康熙嘉興府志》卷 18，頁 1083 下。

<sup>73</sup> 清·袁國梓纂修，清·徐善，〈記·附楞嚴寺經坊總論〉，《康熙嘉興府志》卷 18，頁 1083 下。

同樣，僧永覺元賢（1587-1657）亦清楚揭示此問題。認為刻藏後繼無適任者，尤其感嘆欠缺高超人品的承擔與付出，致使完刻遙遙無期。故言：

第惜當日任事者，唯法本道開二師而已。法本早已作古，道開亦以病隱去，老人且以妖書之旤，竟至長逝。而刻藏之緣，遂乃中阻。後雖有繼之者，率不得其人。唯賴金壇諸金湯，稍續刻之。然僅及十之六七，又不知完局當在何時也。吾觀紫栢之悲心熱腸，如惜命根，如球頭然。而後人乃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非徒無益，且因以為利焉。人品之相懸，何至此乎。<sup>74</sup>

因此利根慶有意插手刻藏事務，或許亦緣於「漸不得人」或「率不得其人」，而導致刻藏遲滯不前，故立願誓求完成紫栢刻藏未完之志。

徐善針對順治初年物價上揚影響紙值騰貴的原因，及有志之士上書提請改革經價弊端情事，指明自順治初年至 16 年間「片板不刻」，唯印刷流通且寺僧每每抬高經價，所獲盈餘俱入私囊，腐化之情嚴重。於是嚴大參首倡改革，嘉興仕紳等相隨應和，上書巡憲使，徐善亦參與其中。最終始得減至經價每百頁八分。而稽查寺中所得請藏總金額僅為「3965 兩 4 錢」，況且此時已刻者「僅四千餘卷」，距離六千三百餘卷，尚有兩千多卷未刻就。徐善指出：

虞山汲古閣毛氏捨刻千卷，有奇沉閣未印，至是典守得人，刻工漸舉。錢牧齋宗伯屬毛氏送板合璧。又用羨貲購得吳門慧慶寺所藏正法念處經七十卷，至癸卯歲（康熙 2 年，1663），又續刻千餘卷，而大藏告成矣。嚴君大叅謂紫栢八十年之願力，至是始就，

■

<sup>74</sup> 清·釋道霈重編，〈請方冊藏經記〉，《永覺元賢和尚廣錄》卷 15，《卅新纂大日本續藏經》冊 72，台北：白馬寺印經會恭印，出版年代不詳，頁 467 中-下。

宜減價以惠衲子，以其事請之秀水令王公覈定經直，每百六分四釐，改編畫一，俾永遵焉。<sup>75</sup>

常熟虞山毛晉捐刻《嘉興藏》，並送藏板至徑山化城寺一事，主要緣自錢謙益之遊說，錢謙益稱言：「今毛氏經板已一一送歸化城，合算已得什之八九，正浮圖合尖之日」。<sup>76</sup>

此外，《嘉興藏》的完刻，根據徐善的說法，楞嚴寺以餘款購得吳門（蘇州）慧慶寺所藏《正法念處經》七十卷，慧慶寺本身有書籍雕印之設，<sup>77</sup>至康熙 2 年（1663），又續刻千餘卷，稱「大藏告成矣。」然《嘉興藏》全藏完成於康熙 2 年之說，就相關文獻與學界研究顯示，可信度低。誠如前見顯愚禪師稱利根慶逐一完成刻藏，同樣很難具足可信度。利根慶的完藏與徐善所稱康熙 2 年大藏告成之說，只能視為書寫者自我對《嘉興藏》刻刊刻歷程的一方之見，而非對其全面進程的掌握與認知。

再回到經價問題，徐善稱此時，核定經價為「每百六分四釐，改編畫一，俾永遵焉。」但康熙 16 年（1677）又改回遵照順治 16 年的價格：「以上正藏經典共貳佰拾套，遵依順治十六年，奉憲減價批示，每百頁紋銀捌分。」<sup>78</sup>而康熙 16 年的「續藏經值畫一」規定：「以上藏外經典并諸方語錄、雜集玖拾套，遵依順治十六年，奉憲減價批示，每百頁紋

II

<sup>75</sup> 清·袁國梓纂修，清·徐善，〈記·附楞嚴寺經坊總論〉，《康熙嘉興府志》卷 18，頁 1084 上。

<sup>76</sup> 清·錢謙益，〈與黃觀止〉，《錢牧齋先生尺牘》卷 2，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 年，頁 134。有關毛晉助刻嘉興藏之詳情，可參考陳玉女，〈明末清初嘉興藏刊刻與江南士族〉，頁 354-358。

<sup>77</sup> 清·楊謙，《朱竹垞先生年譜》，收入《清初名儒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2006 年，頁 541。於康熙 41 年（1702）條記載，朱彝尊「輯《明詩綜》，開雕於吳門白蓮涇之慧慶寺。」

<sup>78</sup> 無名氏編，〈遵依北藏字號編次畫一〉，收入《嘉興藏目錄》，頁 23943。

銀捌分。」<sup>79</sup>據載，康熙年間刻成的《嘉興藏》經全部為「六千三百一十卷，徑山藏板，本郡楞嚴寺流通。」<sup>80</sup>與《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釋家類·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記載九千九百七十五卷，相差三千六百六十五卷，顯然康熙之後《嘉興藏》續刻並未停止。<sup>81</sup>至於臺北國家圖書館（又稱臺灣中央圖書館）藏版與民國9年（1920）北京刻經處刊本影印版所列續藏經目錄，雖均註記為康熙16年的「續藏經值畫一」，但不一致。可見續藏、又續藏的刊刻，並未於康熙年間全然完就，而是隨時增刻。<sup>82</sup>

一、二百年《嘉興藏》刊刻過程中，續刻所選取的經卷有其變化，依此可理解「各學者談及這部大藏的函、種、卷數時數目不一的原由。」因此「依據各種目錄統計亦不能完全反映《嘉興藏》的實際情況。」<sup>83</sup>即使近年來中國陸續整理出版《嘉興藏》文獻，但由於《嘉興藏》流傳甚廣，尚未被收錄的經卷、語錄及流傳海外之《嘉興藏》不為鮮少，故猶待更多的調查、搜集和彙整。僅憑現有幾部《嘉興藏》的出版，是很難

## ■

<sup>79</sup> 無名氏編，〈遵依北藏字號編次畫一〉，收入《嘉興藏目錄》，頁23974。

<sup>80</sup> 清·袁國梓纂修，〈書籍·國朝〉，《康熙嘉興府志》卷18，頁1083上。

<sup>81</sup>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釋家類·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頁1。

<sup>82</sup> 韓錫鐸，〈我所了解的《嘉興藏》〉，《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論文集》，宜蘭：佛光大學，2009年，頁280。韓氏一文指出：嘉興藏「書版的數量是不斷變化的，有新刻的增加了，也有朽爛的減少了，所以《經值畫一》修訂過多次。」

<sup>83</sup> 楊玉良，〈故宮博物院藏《嘉興藏》初探〉，《故宮博物院院刊》3，頁22。稱北京故宮藏有《嘉興藏》目錄五種，除前述兩種目錄外，還有「一、《永樂北藏目錄》，二、清順治年重刻《大明三藏聖教目錄》，三、乾隆年內府抄本《續藏·又續藏目錄》。這五種目錄「不僅互有差異，而且與故宮藏《嘉興藏》的實際情況也有明顯的不同。」「故宮所藏的一部較臺灣中央圖書館所藏的一部多二百二十餘種，卷數也不完全一樣。」

對其「續修起迄年代和情況」有一致的說明。<sup>84</sup>而過程中不斷的增刻、刊印，應是讓《嘉興藏》何時畫上完刻的句點，遲遲未能獲得解明的極根本因素。

康熙初年（1662）住嘉興楞嚴寺僧靈耀（1633-？），字全彰，「對《嘉興藏》的補刻流通很有勞績」，「康熙 18 年（1679）至徑山寂照寺」。<sup>85</sup>其入住楞嚴寺，應是繼順治 16 年至康熙初年楞嚴寺住持淨心之後的新任住持。康熙 17 年（1678）其以楞嚴寺住持身分，致書雙徑化城、寂照兩院諸禪師，深刻反思刻藏難題並提出改善之道。僧靈耀於〈與徑山化城寂照兩常住修刻大藏書〉，首先闡明刊刻方冊藏是楞嚴寺與化城、寂照兩院之根本要務，山上板頭修板有餘，可用來安頓僧眾，「安心進道，不必一鉢千家，資緣世諦」，意義深遠。然日久生弊，感嘆：

弊生經坊，惟知羨餘，而不知整理法寶。上山惟知板頭，而不知修刻藏板。歲月既深，蟲蠹朽蝕。將來大藏，羽化可待矣。<sup>86</sup>

所指摘問題，一如前見，沉痾日久。惟知板頭利，放任藏板腐化不修。恐《嘉興藏》終將化為烏有。其根據康熙 15 年（1676）海鹽縣武原駐車衛後玉菴和 17 年（1678）澹歸和尚（1614-1680）請藏所實際碰到的藏經問題，向兩院僧眾提出正本清源之務，即「修刻大藏」，是其「夙志，而端本之急先務也。」<sup>87</sup>

## II

<sup>84</sup> 楊玉良，〈故宮博物院藏《嘉興藏》初探〉，《故宮博物院院刊》3，頁 22-23。

<sup>85</sup> 楊維中，〈幽溪傳燈嫡孫天溪受登行曆考述——明清時期天臺宗「桐溪法系」考述之二〉，《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5，2017 年，頁 94；清・釋靈耀，《隨緣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作者簡介」，無標頁數。

<sup>86</sup> 清・釋靈耀，〈與徑山化城寂照兩常住修刻大藏書〉，《隨緣集》卷 2，頁 527 中。

<sup>87</sup> 清・釋靈耀，〈與徑山化城寂照兩常住修刻大藏書〉，《隨緣集》卷 2，頁 528 中。

玉菴請藏時所見問題，為「三人共閱，部帙失次，錯簡失張，莫可枚舉。有張無數十百字或五六字、一二字者。」而澹歸和尚請藏，碰到經藏「其首面經論，輒多殘缺，而黃龍禪師檢出缺字尤多。推其所由，板非鐵石，歲久朽蠹，理之固然。」<sup>88</sup>康熙 17、18 年，當澹歸請藏嘉興時，楞嚴寺有意請其擔任住持，但為其所拒。此時也正是僧靈耀準備前往徑山寂照寺之際。澹歸自述：「下江叢林風氣不堪著眼，楞嚴有請住之舉，已力辭之」。然楞嚴寺不放棄，「昨晚同安來會，復有從庾吾兄為楞嚴再請之說。」<sup>89</sup>澹歸直言：

辭楞嚴之請，蓋以老病偷安，詳思之未為至當，蓋般若流通之地，近來內僧外護視為奇貨。<sup>90</sup>

澹歸指直楞嚴寺流通之弊，在於寺僧與外護視藏經流通獲利為奇貨可居。此觀察與前述楞嚴寺經坊經營之失無異。

楞嚴寺由於長期的人事糾葛，後繼乏人，加上寺僧視流通之利大於經板之刊刻與維護，導致刻板腐朽嚴重。蘇州吳江松陵一帶護法居士「深憂藏板不修，則佛法壅塞，柏密二大師慈悲心血，殆將付之東流一派。」故「以修刻經板，重整大藏之役」，責成僧靈耀肩負此任。靈耀透過書信一再勸說兩院僧眾，曉以大義，務必重視藏板修補與重刻的工作。他說：

祇緣大清國之內之外，惟此一藏。其來敦請者，不辭千萬途程歲月勞頓。及請至所在，開卷展閱，則模糊失錯。一字之缺，理即

■

<sup>88</sup> 清·釋靈耀，〈與徑山化城寂照兩常住修刻大藏書〉，《隨緣集》卷 2，頁 527 中。

<sup>89</sup> 明·釋今釋，〈尺牘之一：與丹霞樂說辯和尚〉，《徧行堂續集》，據清光緒間釋惟心鈔本，收《禪門逸書》冊 14，臺北：宗青圖書出版社，2000 年，頁 189 下；同書〈尺牘之二：與朱葵石太守〉，頁 212 下。

<sup>90</sup> 明·釋今釋，〈尺牘之一：與塵異但大師〉，《徧行堂續集》，頁 193 下。

難明，況多多乎哉。倘欲來寺對補，則道遠路遠，山川阻深。……則知板上一字殘缺不修。即如來之血脉一點不通於天下四海矣，過當何如哉。<sup>91</sup>

同時分析這些年未行修板，另因康熙 13 年（1674）發生耿精忠（1644-1682）據閩地叛變的甲寅之變以來，牽動滇黔川貴桂粵閩臺等區域甚廣，阻斷請藏的需求。故言：

竊迹數年間，不能修板，亦有其故。自甲寅用兵以來，關山阻隔，請藏無人。故致坊內經本殆空，而上山板頭絕望，即守院數口，尚費支吾何能分枵腹之餘，以補蠹蝕之殘哉。<sup>92</sup>

因戰事交通受阻，請藏無人，自無板頭錢可收，遂而影響僧眾生計，連帶無力修補殘板。但欲行重刻，僧靈耀便須問明寂照庵藏板狀況，始能估算所需時程和經費。評估結果為：

全朽藏板六百餘葉，稍稍蠹蝕亦數十萬字，并焚板等項，所費不及千金，工程不出三載。較之當日眾護法倡興之時，不過一部刻資耳。<sup>93</sup>

據此，康熙 17 年前後，寂照庵貯存方冊藏板的情況，可略見端倪。至於後續《嘉興藏》重刻情形如何，未見僧靈耀有任何相關的追記。

徐善認為康熙 2 年大藏告成，卻又指出經歷「十六、七年」後經坊的種種流弊，建議規制宜恢復原先規定。其提出的時間約在康熙 20 年左右，適值僧靈耀於康熙 18 年離開楞嚴寺前往化城寺的第三年。故徐善所觀察楞嚴寺經坊的多種弊端，應涵蓋僧靈耀任楞嚴寺住持時的某些

■

<sup>91</sup> 清·釋靈耀，〈與徑山化城寂照兩常住修刻大藏書〉，《隨緣集》卷 2，頁 528 上。

<sup>92</sup> 清·釋靈耀，〈與徑山化城寂照兩常住修刻大藏書〉，《隨緣集》卷 2，頁 528 下。

<sup>93</sup> 清·釋靈耀，〈與徑山化城寂照兩常住修刻大藏書〉，《隨緣集》卷 2，頁 528 下-529 上。

情形。徐善建議楞嚴寺經坊，宜恢復之制，有五。其中經「板宜歸一」的討論，是刻藏以來一直存在的問題，直到清末依舊未行適當處理。

僧靈耀提倡重刻經板之後，至雍正元年（1723）又見補刻嘉興楞嚴寺藏經的呼籲，由宰官浙江巡撫都御使李馥撰序，稱紫柏大師「以大藏刊為書本，貯以楞嚴寺中」，板存楞嚴寺，似成舊習。「歷今百有餘年，板多漫漶，兼有亡失」。「余……不揆闇蔽捐貲補刻，使完舊觀，俾世出世間尊信流通。」<sup>94</sup>據說，此舉引起雍正帝不滿，要李馥適可而止。又稱《徑山藏》在雍正元年補刻之後，「楞嚴寺的經版全數送入衙門監管、查刻，隨著文字獄的大興，《徑山藏》的刊行流通暫時中止。」<sup>95</sup>不過此說猶待斟酌，尚未出現力證外，且雍正以後，仍見嘉興楞嚴寺有經板貯藏之文獻記載。

雍正對於《嘉興藏》的干預，其理由，如同徐善對經坊弊端的觀察，建議宜限制「送板日濫」之弊。徐善指出：「啟禪間禪宗鼎盛，海宇風靡，迄今老成凋謝而濟洞兩家枝條漫衍，輦板附藏者幾無虛月，其間果一無可議者乎。」<sup>96</sup>禪師語錄入藏者日漸加多，有其浮濫之嫌。徐善質疑臨濟、曹洞兩宗派之經板附藏者眾，豈無可議者。針對這一點，雍正也直言此為《嘉興藏》不當之處，宜刪汰修正。於雍正 13 年（1735）說道：「民間私刊書，本板在浙江嘉興府，謂之南藏。」發現明代官板北藏，「未經精校，不足據依」，更何況民間南藏。因此邀集宗教兼通之僧於「京師賢良寺」，「曉夜校閱，鳩工重刊」。「又歷代名僧所著義疏，及機緣語錄，各就其時所崇信者，陸續入藏，未經明眼辨別淄澆，今亦

■

<sup>94</sup> 清·李馥，〈補刻嘉興藏楞嚴寺藏經序〉，《徑山藏目錄》冊 4，頁 105 上-105 下。

<sup>95</sup> 謝磐后（釋法幢），〈刊刻與流通過程〉，《法寶流通：《徑山藏》的文獻價值與文化傳播影響》，頁 73。

<sup>96</sup> 清·袁國梓纂修，清·徐善，〈記·附楞嚴寺經坊總論〉，《康熙嘉興府志》卷 18，頁 1084 下。

不無刪汰，俾歸嚴淨。」<sup>97</sup>可以想像，雍正藉入藏浮濫之由，行清理佛門等文字獄之實。而雍正時期《嘉興藏》目錄當受此而有所更動。

時至乾嘉年間，負責楞嚴寺經坊執行結集並修補經板重務者，為僧真傳會一（1759-1812）法師，蘇州吳縣人，乾隆 52 年（1787），「住嘉興楞嚴寺，矢志募修大藏經版」。<sup>98</sup>據〈募置雲林寺經藏疏〉：

余謂明時幻余密藏二師所刻正續二藏方冊經版，近在嘉興楞嚴寺，今有吳僧會一掌其事。散者已集，闕者已補。刷印裝訂不過三四百金，即可集事，似不甚難。<sup>99</sup>

同是蘇州吳縣人的石韞玉（1755-1837），對此補刻《嘉興藏》事，自揣：「余思二十年宦遊四方，今間（閑）居杭城，又適逢楞嚴寺修治經版之秋」，遂發願與十方善信共行結集。<sup>100</sup>而石韞玉的〈嘉興楞嚴寺經坊記〉，詳述了會一法師被聘任為般若堂經坊補刻藏經一事。楞嚴寺經坊之設，原為發經流通，矢志永久，然「其後紹述無人，道場頹廢。楞嚴所設經坊有名無實，而徑山所藏經版亦朽蠹過半，識者傷之」。<sup>101</sup>蘇州彭紹升（1740-1796）之侄彭蘊輝（1761-1793）與吳璥（1747-1822）發願修補，請會一上人住般若堂主其事。

嘉慶 8 年（1803）張吉安（1758-1829）任餘杭縣令，「將徑山經板盡送楞嚴寺，由會公清□之。而殘缺已多不成卷帙，間有捐刻者。機緣

<sup>97</sup> 高楠順次郎編，〈大清重刊藏經序〉，《昭和法寶總目錄》冊 3，台北：建康書局，1967 年，頁 1430 上。

<sup>98</sup> 清·胡珽述，〈真傳〉，《淨土聖賢錄續編》卷 1，《叻新纂大日本續藏經》冊 78，台北：白馬寺印經會恭印，出版年代不詳，頁 321 下。

<sup>99</sup> 清·石韞玉，〈募置雲林寺經藏疏〉，《獨學廬·三稿》卷 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頁 364 上-364 下。

<sup>100</sup> 清·石韞玉，〈募置雲林寺經藏疏〉，《獨學廬·三稿》卷 2，頁 364 下。

<sup>101</sup> 清·石韞玉，〈嘉興楞嚴寺經坊記〉，《獨學廬·四稿》卷 1，頁 462 上。

未廣，弗克集事。」<sup>102</sup>當時吳璫與京師士大夫集資，「翻刻新板一分，寄歸楞嚴寺中。」此時楞嚴寺住持為竹庵觀公，「列架庋閣，募工刷印。偶有闕失隨時修補。於是方冊經文□還舊觀。」<sup>103</sup>此事於張吉安的《嘉慶餘杭縣誌》亦有明載：

其板向藏餘杭化城寺及寂照庵，亦有在嘉興楞嚴寺者。閱歲既久，兩地經板日就朽蠹。嘉慶七年杭州嘉興善士沈宦生、王松泉等倡議捐貲，將化城、寂照兩刹經板盡數運歸楞嚴，陸續脩補，俾佛法流通，以滿紫師之願，亦一時勝果。<sup>104</sup>

嘉興善士沈宦生、王松泉等倡議，「將化城、寂照兩刹經板盡數運歸楞嚴」，亦即將經板統一送歸嘉興楞嚴寺管理，一反先前以來藏板歸化城、寂照兩地貯藏的規定和呼籲。而藏板盡存於嘉興楞嚴寺統一管理、進行修補，至此似成嘉興刻藏進程中難以違逆的事實。不過會一法師此次修補工作仍未告成，即石韞玉所言，會公受彭蘊輝的請託，前來楞嚴寺般若堂經坊，「苦心勞慮越十有餘年，其事迄用無成」。最後由住持竹庵觀公繼會一法師未竟之業。<sup>105</sup>

關於楞嚴寺般若堂堂主與楞嚴寺住持之間執掌的分寸拿捏，始終影響著刻藏的進展。當徐善建議恢復楞嚴寺經坊原有規制時，曾建議避稱般若堂住持，以防一寺二主導致雙方的對峙與衝突而障礙刻藏事務。但事實上，如前見，後續仍不時發生藏板不刻、經價上漲之弊。故雙方若能合力而行，自能有利於刻藏之推行。正如石韞玉所述，當會一法師在楞嚴寺般若「堂結集經板時」，楞嚴寺方丈藹如和尚尊重其職，「不與其事」。雙方遵守紫柏「大師初立經坊於般若堂與禪堂並建，彼此不相涉」

<sup>102</sup> 清·張吉安修，清·朱文藻等纂，《嘉慶餘杭縣誌》卷 39，頁 559 上。

<sup>103</sup> 清·張吉安修，清·朱文藻等纂，《嘉慶餘杭縣誌》卷 39，頁 559 上。

<sup>104</sup> 清·張吉安修，清·朱文藻等纂，《嘉慶餘杭縣誌》卷 39，頁 559 上。

<sup>105</sup> 清·石韞玉，〈嘉興楞嚴寺經坊記〉，《獨學廬·四稿》卷 1，頁 462 下。

的初衷。之後，繼會一任經坊的竹庵觀公，「乃身任經坊之事，由是般若堂與方丈合而為一，有仔肩之任、無掣肘之憂。」<sup>106</sup>

石韞玉的此一記載極為重要，讓我們更清楚了解楞嚴寺般若堂經坊與楞嚴寺方丈之間的分合確實對刻藏事務造成相當的衝擊和影響。竹庵觀公住持嘉興楞嚴寺十五年，石韞玉評價其任內，「結集經坊，道場香潔，百廢具舉。」之後，竹庵觀公深感「吾胡為久居於此乎。」於是以楞嚴寺法席交付其徒圓覺法師。<sup>107</sup>然楞嚴寺的經板，龔自珍（1792-1841）指出，「康熙中，由徑山遷嘉興之楞嚴寺，今時什不存四矣。」<sup>108</sup>「今時」相當於嘉慶、道光年間，經板已喪失百分之六十以上。藏板的日漸消失，當然與經板日久未刻、未修，及未能統一管理、經坊制度蕩然，以及「漸不得人」息息相關。

根據以上的檢討，嘉興楞嚴寺自萬曆年間重建，至清代道光年間，該寺歷任住持，在有限的資料下，不明、闕漏者仍多，但大致勾勒如表一，以供相關研究參考。闕漏者有待日後的增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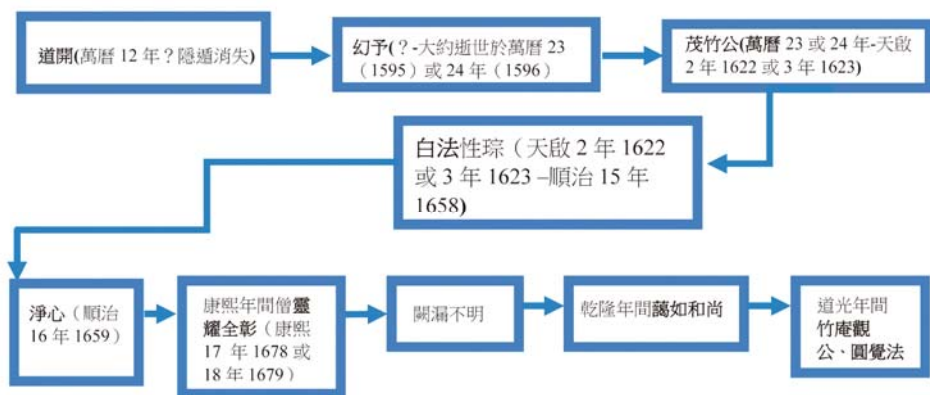
II

<sup>106</sup> 清·石韞玉，〈嘉興楞嚴寺經坊記〉，《獨學廬·四稿》卷1，頁462下。

<sup>107</sup> 清·石韞玉，〈營泉寺記〉，《獨學廬·五稿》卷1，頁592下。

<sup>108</sup> 清·龔自珍，《定盦續集·雜詩》，《四部備要·集部》函191，臺北：新陸，1963年，頁10。

表一：明清嘉興楞嚴寺歷任住持簡表



#### 四、《嘉興藏》的中國境內流通

《嘉興藏》於中國境內，透過請藏方式，流通至各地，同時也以商品模式販售至海外，甚至藉由人群的移動，如明清鼎革大規模人群的海內外流動遷徙，或是區域之間因佛教僧俗人士的行走往來與交流，而將其傳入各地。流傳之幅員廣大，遠超過可以想像的範疇。思考其由，《嘉興藏》為民間私刻藏經，方便購買、易於攜帶，是其得以廣泛流通的關鍵因素。其請藏或購買方式遠較請買官版藏經來得方便容易，故各地紛紛前來嘉興楞嚴寺請印。就中國境內流通而言，縱如交通偏遠的滇黔或東北遼陽等邊域地區，亦不辭千里迢迢前來請藏。誠如僧永覺元賢（1578-1657）所說，價廉省事之《嘉興藏》刊刻，易於流通，縱使窮鄉僻壤，亦得見佛法流播。其言：

紫栢老人痛劇於衷，乃與諸宰官，往復較量，易梵帙以方冊。以其價廉而功省，易為流通。使寒邦僻邑，皆得窺佛祖之秘謀。甚善也。<sup>109</sup>

而木陳道忞（1596-1674）的〈募楞嚴方冊藏經疏〉亦表達私刻方冊藏易於得手，且可盡情鑽研讀誦。故言：

南宮之琅函半蠹，北闕之玉軸未頒。與其遠莫致夫帝閭，貝多重複，曷若近易為于橋李，方冊裝潢。披展几窗明淨之前，一任鑽穿故紙，了殘星月交光之下，不妨看透牛皮。<sup>110</sup>

陳垣亦描繪與此相應的景象，言及明末之前的藏經，「率皆梵筴，印造不易，請施尤藏難，宇內叢林，有藏經者十不得一，遐陬僻壤，更終年莫睹一經矣。」<sup>111</sup>之後，「迨運會既開，流風遂扇，宮廷既有全藏之頒，林下復有方冊之刻，齎經之使，不絕於途，名山之藏，燦然大備。」<sup>112</sup>意指，明末以來因宮廷頒賜經藏予天下山林，又有私刻方冊藏的刊行，致使「齎經之使」頻繁往來於路途之中，不管是官方藏經的頒贈或私刻《嘉興藏》的請購。故言：「蓋自方冊藏經，省梵筴全文之半，建者、運者、貯者、閱者，均稱簡便，於時請藏之風極熾。」<sup>113</sup>其舉粵僧函可（1612-1660）請藏事，說道：

II

<sup>109</sup> 清·釋道需重編，〈請方冊藏經記〉，《永覺元賢和尚廣錄》卷15，頁467下。

<sup>110</sup> 清·道忞，〈募楞嚴方冊藏經疏〉，《布水臺集》卷17，《明版嘉興大藏經》冊26，頁374下。

<sup>111</sup> 陳垣，〈藏經之遍布及僧徒撰述第七·鷄山八剎〉，《明季滇黔佛教考》卷2，頁81。

<sup>112</sup> 陳垣，〈藏經之遍布及僧徒撰述第七·鷄山八剎〉，《明季滇黔佛教考》卷2，頁81。

<sup>113</sup> 陳垣，〈藏經之遍布及僧徒撰述第七·貴陽大興國遵義西來等六寺〉，《明季滇黔佛教考》卷2，頁86。

吾粵函可大師之遣戍瀋陽也，亦為請藏。順治實錄載：「……於順治二年正月內，自廣東來江寧刷印藏經。今以路通，向臣請給印牌，因出城盤驗，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鍼書稿，又有變記一書，函可不行焚毀。」按順治二年正月，北京已陷，南京岌岌可危，而請藏一事，並未因亂停止，其時風氣可想。<sup>114</sup>

而貴州遵義西來、禹門二寺，留有明藏，貴陽黔靈山「更有支那本」。「清代藏書家所謂支那本，即指方冊本，以書口有『支那撰述』四字也。」<sup>115</sup>

此外，雲南雞足山各寺請藏，悉檀寺則於「天啟十四年（1641），僧道源『往朝普陀，又請嘉興府《藏經》一部，貯大殿中。』」<sup>116</sup>道源即弘辯，徐宏基（？-1645）為其浙中請藏賦詩〈雞足僧弘辯請藏浙中，因遊天台〉：

親依智者坐天臺，為請琅函杖錫來，歸夢夜縣雲磬寺，征帆朝背雨花臺。三車獨向林中演，八部同瞻海上回，天樂幾曾聞講席，青蓮應自舌端天。<sup>117</sup>

可察自滇至浙請經，途中亦藉舟船之便，非全靠陸路運送。又〈送上孫長老請臧（藏）還雲南〉詩云：「梁州萬里向天邊，帆帶吳雲入楚煙，

■

<sup>114</sup> 陳垣，〈藏經之遍布及僧徒撰述第七·貴陽大興國遵義西來等六寺〉，《明季滇黔佛教考》卷2，頁86-87。

<sup>115</sup> 陳垣，〈藏經之遍布及僧徒撰述第七·貴陽大興國遵義西來等六寺〉，《明季滇黔佛教考》卷2，頁88。

<sup>116</sup> 明·錢邦纂，清·范承勳增修，《雞足山寺志》卷10，《中國佛寺志》第3輯第2冊，台北：丹青圖書出版，1985年，頁802；陳垣，〈藏經之遍布及僧徒撰述第七·雞山八刹〉，《明季滇黔佛教考》卷2，頁83。

<sup>117</sup> 明·錢邦纂，清·范承勳增修，《雞足山寺志》卷10，《中國佛寺志》第3輯第2冊，台北：丹青圖書出版，1985年，頁802；陳垣，〈藏經之遍布及僧徒撰述第七·雞山八刹〉，《明季滇黔佛教考》卷2，頁83。

法堀自今歸六詔，香風相送渡湖船。」<sup>118</sup>亦見水陸交錯乘載《嘉興藏》之景。而〈送悉菴禪人江南請藏〉詩云：

吾家遠住在天邊，此去江南路萬千，三藏靈文山嶽大，五燈慧命一絲懸。洞庭渺渺天連水，黔國悠悠地接滇，將此身心奉塵刹，教興無礙祖師禪。<sup>119</sup>

點出遠在天邊，位在國之邊境之人，前去江南路遠千萬里，為請藏亦不辭千里之遙。而「洞庭渺渺天連水，黔國悠悠地接滇」之詩句，同樣呈現水陸網絡為請藏者帶來交通上的某種便利性。

另，同雞足山的迦葉殿僧慧輝為破山和尚（1597-1666）四世孫，迦葉殿原有賜藏，因戰亂而遭受摧毀。為此僧慧輝亦遠至嘉興請藏。記載：

滇繫藝文五，載康熙間李仙根迦葉殿藏經記云：「是山八大刹，有賜藏者四，兵燹迭罹，半付劫灰。僧慧輝為破山老人四世孫，住持迦葉殿，觀其厄，傷焉，爰走姑蘇，苦募四寒暑，遂得正藏三百三十函，為卷六千七百六十。貯以十四箱，並諸佛像，莊嚴以歸，而遠乞記於余。」<sup>120</sup>

僧慧輝前往嘉興請藏，前後歷經四年，始得請回「正藏三百三十函，為卷六千七百六十。」陳垣按此判斷，「《嘉興藏》全部三百四十三函，此云三百三十函，蓋其時十三函尚未刻成耳。」<sup>121</sup>

■

<sup>118</sup> 清·釋祖玄錄，清·釋宗上編，〈送上孫長老請臧（藏）還雲南〉，《山暉禪師語錄》卷9，《明版嘉興大藏經》冊29，頁70下。

<sup>119</sup> 清·釋祖玄錄，清·釋宗上編，〈送悉菴禪人江南請藏〉，《知空蘊禪師語錄》卷下，《明版嘉興大藏經》冊37，頁768下。

<sup>120</sup> 陳垣，〈藏經之遍布及僧徒撰述第七·鷄山八刹〉，《明季滇黔佛教考》卷2，頁84。

<sup>121</sup> 陳垣，〈藏經之遍布及僧徒撰述第七·鷄山八刹〉，《明季滇黔佛教考》卷2，頁

請藏之辛勞，不言可喻。譬如知空蘊禪師（1613-1689）之〈送宗燈禪人江南請藏〉所云：

古人為法不辭勞，末世修行喜枕高，剖背藏經開正眼，捨身求偈裂吹毛。柴師西涉情忘趾，羅什東遊德可褒，鷄足慶雲從此現，吾門幢子接天高。<sup>122</sup>

再如閩僧永覺元賢（1578-1657）於〈請方冊藏經記〉，提及崇禎元年（1628），秀實居士前來福建建安荷山造訪，<sup>123</sup>談起「方冊藏經」，僧元賢遂「欣然願請之」。於是于同年六月八日，「冒暑踰嶺，七月朔抵樸李楞嚴寺，以暑毒抱病甚劇，半月而病差，請經以歸。」<sup>124</sup>

從福建建安到浙地嘉興，僧永賢花了一個多月的路程，時值盛暑，抱病半個月始癒。請藏回程中，途遇「錢塘值海潮之變，水陸居民，滔沒者以萬計。」僧永賢說：「余舟獨脫於險，則藏經之力也。然帆落水，而舟幾覆者亦三矣。」船行至錢塘江上游支流衢江到衢州府的清湖鎮，「山溪亦湧漲，平陸成江者七日。及水落，則路崩橋折，涉者往往遭溺。」至同年八月十七日，始回到福州府福清縣富沙，臨近閩江。僧永賢請藏前後歷時兩個多月，多靠河網水運之便，但途中驚險萬分。故言：

■

84。

<sup>122</sup> 清·釋祖玄錄，清·釋宗上編，〈送宗燈禪人江南請藏〉，《知空蘊禪師語錄》卷下，《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37，頁 768 下。陳垣釋義，「時知空新闢楚雄九臺山大方廣寺，疑此二僧殆為九臺請藏，所請亦嘉興藏也。」參見陳垣，〈藏經之遍布及僧徒撰述第七·黔僧與嘉興藏之關係〉，《明季滇黔佛教考》，頁 86。

<sup>123</sup> 清·釋道需重編，林之蕃撰，〈福州鼓山白雲峯湧泉禪寺永覺賢公大和尚行業曲記〉，《永覺元賢和尚廣錄》卷 30，頁 576 上-下。載：「師諱元賢。字永覺。建陽人。……時癸亥秋九月。師年四十有六矣。居甌寧金仙庵。閱大藏三年。徙建安荷山。明年之樸李。請藏經歸。作建州弘釋錄。」故得知荷山位在福建建安。

<sup>124</sup> 清·釋道需重編，〈請方冊藏經記〉，《永覺元賢和尚廣錄》卷 15，頁 467 下。

嗚呼斯藏詎可容易哉，紫栢如申包胥號泣秦廷，苦心血淚。積數十年之久，始克就此。而居士慷慨揮金，余則出萬死一生，以獲斯藏，斯藏詎可容易哉。<sup>125</sup>

希望誦讀方冊藏經者能發揮佛教義理致用之學，「不負刻者、請者之勤勞。」<sup>126</sup>

而前見澹歸和尚於康熙 17 年（1678）前往嘉興楞嚴寺請藏，乃為廣東丹霞山別傳寺而行。此寺為澹歸於康熙元年（1662）所開闢之道場。其從丹霞至嘉興請藏，路途亦「歷盡險阻得達吳越」，寄宿「當湖陸氏園」。<sup>127</sup>筆者於 2018 年 7 月 18 日前往丹霞別傳寺進行《嘉興藏》刊本調查。<sup>128</sup>此處位在峭巖陡壁之間，為隱遁者僻居棲息之地。步履之險，令人餘悸猶存。據澹歸描述：「丹霞之山峻拔僻遠」。<sup>129</sup>又言：

丹霞山別傳寺者，踞海螺墩絕壁之上，右折一徑則錦石巖，志所稱巖中石壁，五色間錯者也。左折一徑逶迤，緣梯而登入海螺巖，

■

<sup>125</sup> 清·釋道需重編，〈請方冊藏經記〉，《永覺元賢和尚廣錄》卷 15，頁 467 下。

<sup>126</sup> 清·釋道需重編，〈請方冊藏經記〉，《永覺元賢和尚廣錄》卷 15，頁 467 下。

<sup>127</sup> 清·徐乾學，〈丹霞澹歸禪師塔銘〉，《丹霞澹歸禪師語錄》卷 3，《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38，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 年，頁 312 下。陸氏園，指的是當湖人陸孝山的別墅。澹歸禪師營建丹霞別傳寺時，「以陸孝山（世楷）之助為多。孝山為禪師中表，任南雄知縣；其後孝山又建龍護園為丹霞下院。」參見吳天任，《澹歸禪師年譜》，香港：香港志蓮圖書館等助印，線裝本，1989 年，丹霞別傳寺藏，頁 77。

<sup>128</sup> 此行為執行科技部補助專題計畫之移地研究，一同參與調查的有李貴民博士，及筆者所指導的黃湘媚和簡瑞瑤兩位博士生，黃湘媚同時是本專題計畫的兼任助理。有關本次丹霞山別傳寺的嘉興藏刊本調查之得以順利進行，在此要特別感謝別傳寺悟嚴法師的接待和知客師乾君法師的大力協助。而蒐羅所得之文獻和拍攝影像之整理，要感謝同行者們的協助。

<sup>129</sup> 明·釋今釋，〈丹霞建置說〉，《徧行堂集》卷 3，據清光緒間釋惟心鈔本，《禪門逸書》冊 12，臺北：宗青圖書出版社，2000 年，頁 88。

絕壁之下，下望之如層城，上倚之如列屏。其地蜿蜒伸縮，開麓者九或深三四十丈、二十丈、十餘丈。如西番蓮，一一瓣相附麗天成。下臨大江，明砂繡發清瀾鏡徹，外則近嶺獻奇遠峰爭媚，蓋山水之奧區也。<sup>130</sup>

除請藏路程所需承擔諸多難以預料的風險外，單單將一部卷帙浩繁的藏經從丹霞山山腳下搬運至山頂的別傳寺，已足以道盡路程的驚險與艱辛。只要參見圖二至圖七（2018/7/18 拍攝），多少可以理解文獻所述請藏不易之箇中幾許道理。圖七，乃吾等一行人於別傳寺調查《嘉興藏》刊本之後，回程中再次巧遇去程時所遇見馱運商販的身影，也許是位發心幫別傳寺馱運物資的信者。但不管是何身分，都深深撼動我們，肩挑重達數十公斤的瓦斯桶及寺方所需物資，舉步維艱的緩步登階而上，前進丹霞山，揮汗如雨。若藉此畫面回首過往，似乎不難想像三百四十多年前，澹歸和尚將《嘉興藏》託人送回丹霞山別傳寺時，其顛簸蜿蜒山徑中搬運浩繁厚重之大部藏經的艱難情狀。



圖二：丹霞峭巖陡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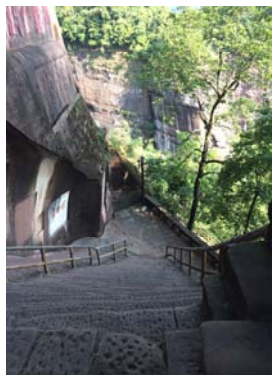
圖三：丹霞山別傳寺入口



圖四：四周嶙峋山峰環抱別傳寺

■

<sup>130</sup> 明·釋今釋，〈丹霞營建圖畧記〉，《徧行堂集》卷3，頁271下-272上。



圖五：高聳矗立的台階



圖六：膽戰心驚緩下步  
(由下而上依序為陳玉女、  
簡瑞瑤、黃湘媚)



圖七：馱運瓦斯、物資人  
士緩步登階送往別傳寺

關於澹歸請藏始末，雖無完整詳細的記載，然相關記述，則散落其書信或詩文之中，若加以蒐羅彙整，或可描繪出相較於其他請藏者較為清晰的圖像。故於此，試圖藉之對請藏的思考、盤纏籌湊、交通路程與辛酸等有形更進一步的觀察。

當澹歸和尚決意於康熙 17 年出嶺請藏時，因「三藩之亂，粵北、贛、湘各地，俱遭兵燹」，<sup>131</sup>於是「選苦行僧」，撿骨埋葬。<sup>132</sup>事畢後，始出嶺請藏。其言：「春杪出嶺請藏」，<sup>133</sup>並向朱廉哉表示：「已將丹霞方丈一席交與樂說大師。偶然有撿白骨之事，事畢便往貴郡請藏矣。」<sup>134</sup>可知朱廉哉縣令是嘉興人，而樂說今辯和尚也於「元旦上堂拈香」，承

<sup>131</sup> 吳天任，《澹歸禪師年譜》，頁 103。

<sup>132</sup> 明·釋今釋，〈撿白骨疏〉，《徧行堂續集》卷 5，《禪門逸書》冊 14，頁 103 上。

<sup>133</sup> 明·釋今釋，〈寄徐浩存方伯〉，《徧行堂續集》卷 10，頁 202 下。

<sup>134</sup> 明·釋今釋，〈尺牘之三：與朱廉哉明府〉，《徧行堂續集》，頁 216 上。

丹霞別傳寺方丈之席，請藏成為澹歸受眾人之託的最大懸念。在澹歸寄給其師兄海幢寺住持阿字今無和尚（1633-1681）的信中談到：

五十金留俟七月，豈以為遲。弟所攜路費八十金，并吾兄四十金，已盡作買紙之用。僅留此項抵路費，正自得宜耳。<sup>135</sup>

澹歸將原作路費的五十金加上今無和尚給予的四十金，合計一百二十金作為購買請藏印刷紙張的費用。剩下的五十金，預定留作請藏路費。此時澹歸為請藏已離開丹霞山，留宿南雄，旅程中因冷熱交逼，罹患重病。自述：「頃在南雄大病，若成瘡便不死。然老年氣血衰憊，抵不得凝冰焦火、日夜顛弄也。」<sup>136</sup>

南雄之後，「六月二十五日度梅關，別樂說於南安，七夕抵南昌」，「七月十九日禪師已出嶺，過匡山棲賢寺」。<sup>137</sup>此時棲賢寺住持為澹歸師兄石鑒今親已示寂，其師天然和尚則駐錫於此。澹歸過匡山（廬山）之後，往鄱陽湖、馬當、彭澤、東流、蕪湖、度揚子江，於八月二十三日抵嘉興。<sup>138</sup>從〈菱豆〉一詩，可窺探其回鄉的心情。<sup>139</sup>於〈賣書〉詩句下，註云：

■

<sup>135</sup> 明·釋今釋，〈尺牘之一：與海幢阿字無和尚〉，《徧行堂續集》，頁186下。

<sup>136</sup> 明·釋今釋，〈尺牘之一：與海幢阿字無和尚〉，《徧行堂續集》，頁186下。

<sup>137</sup> 吳天任，《澹歸禪師年譜》，頁105-106；並參照明·釋今釋，〈集詩之二：六月廿有五度梅關〉、〈與樂說辯弟別於南安〉、〈七夕抵南昌〉、〈候孟昉於郡署之寓〉、〈悼棲賢石鑒親兄〉，《徧行堂續集》，頁264下-265下。

<sup>138</sup> 明·釋今釋，〈與丹霞樂說辯和尚〉、〈鄱陽湖〉、〈馬當〉、〈東流〉、〈皖口〉、〈蕪湖〉、〈度揚子江〉，《徧行堂續集》，頁189上、266上-266下、267下。

<sup>139</sup> 明·釋今釋，〈集詩之二：菱豆〉，《徧行堂續集》，頁267上。「菱豆中秋事，離家久已忘。小舟誰喚此，入耳便還鄉。粵客會知味，吳兒應解囊。宛然舊風物，珍重滿頭霜。」

此集二千紙。客云：藏經百紙三分，今以綿料百紙四分。侍者云：如此則折本。予笑云鄱陽采頭逢鈍市。<sup>140</sup>

澹歸一行人可能為籌湊請藏經費，故有賣書之舉。客人趁機欲以低價收購，按前見康熙 16 年規定經價每百頁八分錢，顯然與客人提出「藏經百紙三分」的價格相差一半，難怪陪澹歸請藏的侍者，有「折本」即虧本之怨。

澹歸談到同年九月廿三日往平湖，其重要護持者陸孝山「約坐七十日，同人相助五十金，湊上路費所餘，以一百零七兩，請得正藏矣。續藏尚需四十金，送回盤費亦須四十金，正在料理不徹也。」<sup>141</sup>可見此時嘉興正藏、續藏已開始販售流通，而未被述及的又續藏是否刊刻完成仍未知數。而澹歸一行十餘人於旅程中仍為請藏之各種用度費心勞苦，<sup>142</sup>含每日食宿，澹歸提到：「自出嶺後，並不見一宰官，即有舊交送督撫幾封先容，竟不投進。請經嘉禾，有以先容劄子屬郡縣者，俱原封納還。」<sup>143</sup>可見請託不易、化緣難就。同時澹歸因受自身俗家俗事牽連，加上「去歲歉，常鎮一路榆皮俱盡」，飢荒嚴重，故感嘆經費之事處理不完，籌湊不易。遂向樂說和尚表示：「頃再走數處料理，得藏事成，就送回丹霞，恐在今秋之杪矣。」<sup>144</sup>亦即預估康熙 18 年（1679）的秋天送藏回丹霞。類似於此，請藏費用短絀，為其艱辛倍添繁重負擔。

澹歸請藏畢，於康熙 18 年「四月初四日已發僧奉回丹霞矣」。<sup>145</sup>但其本人未隨藏船同歸丹霞山。據其言：

■

<sup>140</sup> 明·釋今釋，〈集詩之二：賣書〉，《徧行堂續集》，頁 267 上。

<sup>141</sup> 明·釋今釋，〈尺牘之一：與丹霞樂說辯和尚〉，《徧行堂續集》，頁 189 上-下。

<sup>142</sup> 明·釋今釋，〈尺牘之二：與張皜亭中翰〉，《徧行堂續集》，頁 210 上。

<sup>143</sup> 明·釋今釋，〈尺牘之一：與棲賢角子龜和尚〉，《徧行堂續集》，頁 192 上。

<sup>144</sup> 明·釋今釋，〈尺牘之一：與丹霞樂說辯和尚〉，《徧行堂續集》，頁 189 下。

<sup>145</sup> 明·釋今釋，〈尺牘之三：與蕭柔以參戎〉，《徧行堂續集》，頁 220 上。

藏船發後十日，即過吳門。度夏於半塘壽聖寺，惟乞米耳。此外不開因緣之口，不投一刺於貴人之門也。五月末感冒愈後，兩腳發腫至今未消，自是衰年本等有欲為覓靜室者。<sup>146</sup>

澹歸請藏後，未回丹霞，與其老邁多病有關。其言：「頃遣藏經還丹霞，然筋力俱敝，衰病益深矣」；「頃即往吳門，發藏經入嶺後，更圖一休息地。半年餘奔走勞頓，衰病日增」。<sup>147</sup>故在寫給其師弟角子今龜和尚的書信中，說道：

天下無不散底筵席，不可離了丹霞，常將一條繩子吊住也。細思量澹歸……老了、病了，亦須討個長假。<sup>148</sup>

求離丹霞的心堅定。同樣的心情，亦表露在〈與澤萌遇大師〉的書信裡。其言：

藏願既完，即放出舊日迂板面孔，不似作化主之圓融。以此到處落落難合卻以此自喜也。……今釋……望七之人，時時作死想，而不作死在何處之想。再回嶺南不再回嶺南，亦無處更著此一想。<sup>149</sup>

在〈與塵異但大師〉書信中，再次提及：

■

<sup>146</sup> 明·釋今釋，〈尺牘之一：與丹霞樂說辯和尚〉，《徧行堂續集》，頁 189 下-190 上。

<sup>147</sup> 明·釋今釋，〈尺牘之三：與劉煥之總戎〉，《徧行堂續集》，頁 219 下；同書〈尺牘之三：與汪晉賢文學〉，頁 231 下。

<sup>148</sup> 明·釋今釋，〈尺牘之一：與棲賢角子龜和尚〉，《徧行堂續集》，頁 191 下-192 上。

<sup>149</sup> 明·釋今釋，〈尺牘之一：與澤萌遇大師〉，《徧行堂續集》，頁 193 上。

藏船行後，某過吳門度夏，遂病於此。兩腳浮腫乃脾氣極虛耳。結茅一事絕口不復向人，蓋吾輩所宜乞求者，惟叢席十方，三寶之緣，……。今了無所遇，但化米使不至飢餓而矣。<sup>150</sup>

澹歸留吳期間，日常用度，大多來自當湖諸士的護持，自言：「去夏得病日久日深，頃承當湖諸公相留，每月認供米二石、銀二兩，且可不憂餓死。」<sup>151</sup>然澹歸深知已病嚴重，「不可久已，決意還廬山歸死於叢林」；<sup>152</sup>即「請藏事畢，擬歸隱匡山」，卻因「病遽作，養痾陸孝山使君別業」。<sup>153</sup>康熙 19 年（1680）病卒。

澹歸的請藏經驗未必與其他請藏者同，然從前述請藏者的詩文，或如閩僧永賢請藏時抱病半月餘的煎熬，都一再顯示請藏者的辛勞。再從澹歸一封論及請藏風波的書信中，更見此景，亦得從中反觀請藏風潮之盛。即澹歸〈與張皜亭中翰〉信中，帶點憤怒語氣向張皜亭說明並請其判明解決，也就是針對先前未允諾僧頓覺願代為攜帶藏經至白衣菴的原委，及僧頓覺訛稱師兄阿字今無和尚向其借用請藏資金之不實指控。言：

侍僧還得荅教，以白衣菴藏經見託攜歸。不欲錯因果虛功德具服護法至意。前所以不允頓覺之請，蓋以其心行不實。既欠經坊債，又欠旋法師物未還，恐致貽累。若仗鼎諭與之結絕，則亦不敢不任勞也。丹霞藏經已得圓滿，前貴鄉題數尚有未收者，可移為白衣菴藏經之用。今釋非借題撈摸之人，此在吾兄主持分擘耳。<sup>154</sup>

究竟需要挪移多少資金作為「白衣菴藏經之用」，則有待張皜亭的分配。至於海幢寺阿字今無和尚向僧頓覺借用請藏資金一事，澹歸辯明絕無此

■

<sup>150</sup> 明・釋今釋，〈尺牘之一：與塵異但大師〉，《徧行堂續集》，頁 194 上。

<sup>151</sup> 明・釋今釋，〈尺牘之一：與塵異但大師〉，《徧行堂續集》，頁 194 上。

<sup>152</sup> 明・釋今釋，〈尺牘之二：與徐健菴太史〉，《徧行堂續集》，頁 206 下。

<sup>153</sup> 清・釋今辯，〈丹霞澹歸釋禪師行狀〉，《丹霞澹歸禪師語錄》卷 3，頁 311 下。

<sup>154</sup> 明・釋今釋，〈尺牘之二：與張皜亭中翰〉，《徧行堂續集》，頁 209 下。

事。其言：

頓覺指稱敝法阿字借渠藏資二百金，數千里外無從質證，乃取其所寄白衣菴及海幢之書。拆而觀之，其與白衣菴主書云：謝澄波所借分毫不吐，張賢若不知去向，高州緣已成畫餅。海幢和尚在金陵所目擊者，竝無阿字借銀之說。其與海幢書，但稱世態艱難，苦力數年方得成就，絕無借銀致累之意，并無此間尚欠經價之說。<sup>155</sup>

阿字今無和尚與僧頓覺「師祖契厚」，故重託於張皜亭先父成就白衣菴請藏事，可是僧頓覺書信卻對此無隻字片語。澹歸回憶僧頓覺曾於康熙 11 年（1672）初冬來到丹霞山，「口稱張、謝二人許為請藏領袖，不知其能踐約與否。」遂勸其「莫看張、莫看謝，自向納僧看活計」，「且為渠撰募藏疏文。」但頓覺不出示此文，到平湖沈融谷（1637-1703）諸公處，竟妄稱：

丹霞請藏索其薦書，或見與丹霞無交者，便稱海幢請藏，及聞今釋欲來貴鄉，始至郡城，一見面即面詰其虛誕稽遲之過。渠便欲將藏經交付今釋載還，而自在此化緣。<sup>156</sup>

澹歸為了替其法兄今無受頓覺之謗雪屈，故將頓覺「手書」送交張皜亭親覽，並提議：「頃發侍僧往吳門探船，歸即料理，行計彼藏附去。惟速賜擘畫，勿再蹉跎，法門中自有規矩。」<sup>157</sup>

上述請藏的糾葛，顯現不僅寺僧熱衷於請藏，連俗家亦介入其中，「許為請藏領袖」，卻捲走龐大的請藏費用，反而引起寺院之間請藏的紛爭。如此，不由令人聯想明清時期因請藏風潮所鏈結的社會相關或新興

■

<sup>155</sup> 明·釋今釋，〈尺牘之二：與張皜亭中翰〉，《徧行堂續集》，頁 209 下。

<sup>156</sup> 明·釋今釋，〈尺牘之二：與張皜亭中翰〉，《徧行堂續集》，頁 209 下-210 上。

<sup>157</sup> 明·釋今釋，〈尺牘之二：與張皜亭中翰〉，《徧行堂續集》，頁 210 上。

的行業，除交通運輸業像「藏船」、像紙張製造業、印刷業、搬運業、食宿旅店業等各行業之經營外，代為請藏的行業或是仲介人士是否因應而生，是否藉此穿梭於僧俗之間以謀取最大利源，值得日後更深入的探討。

筆者於 2018 年 7 月 11 日至 20 日，自肇慶鼎湖慶雲寺、廣州光孝寺、海幢寺、六榕寺、清遠飛來寺，至韶關南華寺、丹霞別傳寺，進行《嘉興藏》刊本調查，得知大部分的寺院多因天災人禍致使經藏毀於一旦或幾番輾轉而消失無存。唯獨於丹霞別傳寺藏經閣中堆放著諸多不同年代、新舊混雜的線裝本經書架上，赫然發現《嘉興藏》刊本（見圖八、圖九、圖十、圖十一、圖十二），整理後有 14 冊 68 卷（見表二），寺方不知其藏經閣中仍存有珍貴的《嘉興藏》刊本數冊，望外之喜，可想而知。或許這是對澹歸等人艱辛請藏所僅存而難得的一絲記憶與紀念，縱使不一定是當時請回的原本。然而 14 冊的牌記中，載有萬曆、天啟、崇禎年間及順治十七年的刻印本，應屬嘉興正、續藏版本，與澹歸所述：「以一百零七兩，請得正藏矣。續藏尚需四十金，送回盤費亦須四十金」中所請印的正續藏之說頗相吻合。



圖八：別傳寺藏經閣  
玄關入口處



圖九：發現《嘉興藏》  
刊本的經書架  
（方框標示）



圖十：《嘉興藏》刊本脆化、  
脫漏、蟲蛀狀況嚴重



圖十一：別傳寺藏經閣現存《嘉興藏》  
刊本 14 冊 68 卷



圖十二：別傳寺藏《嘉興藏》  
刊本牌記

表二：丹霞山別傳寺現存《嘉興藏》刊本 14 冊 68 卷

著、譯者	經名	冊數	卷數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般若經	3 冊 1 冊 1 冊	卷 356-370，共 15 卷 卷 356-370，共 15 卷 卷 356-370，共 15 卷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阿毗達摩大毗婆沙論	1 冊	卷 356-370，共 15 卷
唐三藏沙門玄奘奉詔譯	瑜伽師地論	1 冊	卷 86-90，共 5 卷
唐大慈恩寺翻經沙門玄應撰	一切經音義	1 冊	卷 1-4，共 4 卷
實叉難陀譯	大方廣佛華嚴經	1 冊 1 冊 1 冊	卷 1-5，共 5 卷 卷 31-35，共 5 卷 卷 41-45，共 5 卷
唐三藏法師菩提流志奉詔譯	大寶積經	1 冊 1 冊	卷 31-35，共 5 卷 卷 56-60，共 5 卷
	宗鏡錄	1 冊	卷 29-32，共 4 卷

至於請藏的路程，從前面請藏者的簡述中，顯示長江與其支流、湖泊、運河及各地江河支流等是藏船經常行駛的水路要道。嘉興便位在運河與大小水系交錯之中，對其內外的交通聯繫自屬便利。為了具體掌握嘉興楞嚴寺在《嘉興藏》流通上所能借助於此的地利之便，在此就澹歸請藏路程予以細查明究。

澹歸請藏去程，從仁化往南雄，越過梅嶺，進入江西南安，前往南昌，至廬山，越過鄱陽湖之後，一路便利用長江水運，路經長江沿岸馬當、彭澤、東流、蕪湖等城市，爾後可能經南京至鎮江府丹徒，轉入運河，再經蘇州，抵嘉興。至於回程探尋所需藏船，亦前往吳門探詢，想必是循著來時路欲送藏回丹霞山。若對照崇禎年間黃汴纂《客商一覽醒迷天下水陸路程》之〈湖口縣由江西城至廣東水〉、〈南京至江西廣東二省水路〉、〈北京至南京浙江福建驛路〉等水陸路程，則進一步可確認澹歸至嘉興楞嚴寺請藏所途經的詳細路程（見圖十三）。

首先，從南京至嘉興縣的水陸路程，據載：

南京應天府上元縣江寧縣下水九十里、龍潭駟一百一十里、鎮江府丹徒縣、京口駟九十里、雲陽駟丹陽縣五十里、呂城駟今□六十里、常州府武進縣、毗陵駟九十里、錫山駟無錫縣九十里、蘇州府長州縣、吳縣、姑蘇駟四十五里、松陵駟吳江縣、平望駟屬吳江縣西去湖州南六十里、嘉興府嘉興縣秀水縣。<sup>158</sup>

■

<sup>158</sup> 明·黃汴纂，〈北京至南京浙江福建驛路〉，《客商一覽醒迷天下水陸路程》卷1，據崇禎8年9月刊本，日本山口大學圖書館藏影印，自編頁16。



圖十三：嘉興楞嚴寺（圈圈標示處）的海內外交通位置

以上各駟幾乎位在運河航道上。其次，南京到南昌的水陸路程，即：

南京下關龍江駟六十里、大勝駟屬江寧縣□十里、采石駟屬當塗縣二十里、太平府當塗縣六十里、蕪湖縣□里、櫓港駟屬繁昌縣百一十三里、荻港駟屬繁昌縣百□十里、大通駟銅陵縣八十里、池州府貴池□、池口駟九華山東五十里西六十五里、李陽河駟並屬貴池八十里、安慶府□寧□、同安駟百二十里、雷港駟望江縣百二十里、龍城駟彭澤縣百二十里、彭蠡駟湖口縣百二十里、南康府星子縣、匡廬駟百一十里、吳城駟百二十里、樵舍駟並屬新建縣六十里、南昌府南昌縣新建縣。<sup>159</sup>

■

<sup>159</sup> 明·黃汴纂，〈南京至江西廣東二省水路〉，《客商一覽醒迷天下水陸路程》卷2，自編頁46-47。

從南京下關到湖口彭蠡駟等都是屬於長江沿岸的交通要道。至於湖口縣到南昌再到廣東仁化縣更詳細的水陸路程，可參看「湖口縣由江西城至廣東水陸」記載：

本縣入鄱陽湖女兒港、大孤山共六十里、神靈洲共六十里、南康府十里、爪蠡五十里、珠磯六十里、吳城六十里……、南昌府南浦駟、生米觀、河泊所共六十里、……曲港共七十里、豐城縣劔江駟、……、樟樹鎮藥村至此共九十里、臨江府蕭灘駟、……吉水縣、……吉安府螺川駟安福河口、張家渡共百一十里、……萬安縣共百二十里、……大溜灘、小溜灘共八十里、……水東岸、贛州府、……南庾縣南埜駟百二十里、……鷄足一連二灘百二十里、南安府大庾縣橫園駟過大庾嶺即梅嶺、中站即紅梅關六十里、南雄府保昌縣凌江駟下水、鵝頸灘共九十里、黃塘駟、……中洲纂灘共一百里、……上卷尾灘、仁化縣水口……。<sup>160</sup>

據此，從南昌、吉安、贛州到南安，過梅嶺，進入廣東南雄到仁化丹霞，則透過贛、粵境內的水陸運並濟方式，進行藏經載運。大致而言，多半循著明清的商業路程行使藏經搬運。其他地區的請藏路線，同樣可以透過明清時期商人、旅人等普遍使用的天下水陸路程等交通指南，以掌握其可能或可以利用的交通要道。

經過以上對澹歸請藏路程的確認，嘉興水運的便利性清楚可見。而位在嘉興稍稍偏東南的平湖，亦是舟船往來重要港埠，也是藏船重要行經地。澹歸多次述及，親近天然和尚的南海人曠日晉，其〈請藏嘉禾，舟中即事〉亦云：

■

<sup>160</sup> 明·黃汴纂，〈湖口縣由江西城至廣東水〉，《客商一覽醒迷天下水陸路程》卷7，自編頁208-211。

孤舟容膝自能安，咒合灘聲十八盤。……煙橫吳岫知春早，暖入平湖見雪殘。載得一乘歸靜社，手繙千卷解空觀。<sup>161</sup>

這艘藏船先經過蘇州吳地，再駛入平湖，之後載得《嘉興藏》而歸。可見得嘉興、平湖、蘇杭連成一氣的水運網絡，為位處其間的楞嚴寺提供《嘉興藏》流通中國境內的交通優勢。

## 五、《嘉興藏》的海外流通販售

明清時期《嘉興藏》因著十六、七世紀東亞海洋貿易的商品流通，及明清鼎革之際大量明遺民的海外移動，分別傳入日本、朝鮮和越南等東亞諸國。嘉興位處水路網密之域，有利於楞嚴寺《嘉興藏》的對內流通外，想必對其海外的流傳也發揮相當的助力。緊依嘉興平湖的乍浦港，據日本學者大庭脩的研究，乍浦屬於浙江省平湖縣的日本貿易基地。清代南京、蘇州、杭州是出版的中心，京師的書坊也前往蘇州購買再乘船載運而歸。從蘇州、南京出發的是南京船、從杭州出航的是寧波船，乍浦是其中之一。江戶時代後半，約當雍正 13 年（1735）、日本享保 20 年的出貨地點乍浦也在這個區域裡，長崎可說是與中國出版的中心地直接連結，比起中國境內的鄉間更能受惠於書籍的供應。<sup>162</sup>此觀點極為貼切點出，便利的交通和地理位置在商品流通上所佔的優勢。若就嘉興請藏來說，長崎地區的《嘉興藏》請購，其海上便利的交通運輸，

■

<sup>161</sup> 清·徐作霖等編；黃國聲點校，〈請藏嘉禾，舟中即事〉，《海雲禪藻集》，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2017 年，頁 205、206。

<sup>162</sup> 大庭脩，〈第 3 章 積荷の品々〉、〈第 6 章 乍浦と漂流日本人〉，《漂着船物語—江戸時代の日中交流》，東京：岩波書店，2001 年，頁 122、123、209-210；關於唐船出帆轉至乍浦的原由，可參考章宏偉，〈清前期的江南書市與長崎貿易〉，《明清江南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復旦史學輯刊第六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 年，頁 311-312。

的確遠較位在中國境內偏遠難達的山間谷壑的寺庵佛社來得便利許多。而位在如此重要的東亞海貿交易圈的嘉興楞嚴寺，無庸置疑，對其《嘉興藏》的海外流通自屬有利（見圖十三）。

大庭脩強調將《嘉興藏》開版地方移到嘉興，無論如何與江南是印刷業盛行地區有關。此地區藉由唐船直接與日本連結，可以說具有重要的地理關係。所以在嘉興楞嚴寺印行方冊本藏經的話，比較容易傳入日本。<sup>163</sup>職是，從江南印刷業的發達與便利的交通來說，嘉興楞嚴寺被紫柏選作流通藏經要地的地利考量，於此則再次獲得驗證和說明。

大庭脩針對唐船所攜帶的書籍是中國哪個地方所出版的此一問題，表示裝載書籍的船幾乎是南京船和寧波船，由於南京、蘇杭刻書出版興盛，故很自然地從江浙啟航的南京船、寧波船中裝載書籍的船很多。<sup>164</sup>他根據所搜集航抵長崎的唐船中載運大藏經的船舶資料，查得享保4年（1719，康熙58年）三部、享保20年（1735，雍正13年）二部、元文5年（1740，乾隆5年）一部、寬保元年（1741，乾隆6年）一部等五部的藏經紀錄。其中元文5年的一部為長崎的興福寺，俗稱南京寺，即南京人專祀依歸的菩提寺所捐獻請購的藏經外，其他交貨的地點，還有買入的價格均屬不明。

而江戶時代鐵眼道光（1630-1682）的黃檗版一切經，是根據隱元禪師攜帶前來的方冊本萬曆藏經所刊刻而成。隱元禪師（1592-1673）渡日是承應3年（1654），前述五部非《嘉興藏》初傳日本，初傳時間應

■

<sup>163</sup> 大庭脩，〈第三章 漢書籍輸入の研究〉，《江戶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京都：同朋社，1986年，頁426。

<sup>164</sup> 大庭脩，〈第一章 江戶時代における書籍輸入の概観〉，《江戶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頁44-47；王芳，〈『嘉興藏』と江戶時代□一鳳潭『扶桑藏外現存目錄』を中心に〉，《インド哲學佛教學研究》24，2016年，頁65-66。

在這之前。<sup>165</sup>換句話，《嘉興藏》早已於江戶時代初期傳入日本。鐵眼道光的〈刻大藏緣起疏〉亦記載：

嘗憶大明神廟年間，紫柏大師念大藏卷帙繁多，致遐方窮邑有終不聞法名字者，故易梵本為方冊以便流傳，……不數年間竟竣其事。迄今附舶而來者即其本也。<sup>166</sup>

鐵眼認為方冊藏「不數年間竟竣其事」，應是訊息流通上的一種誤差。「迄今附舶而來者即其本也。」指的是《嘉興藏》正藏。一般認為「鐵眼道光以隱元帶來的明版（《嘉興藏》）大藏經為基礎開版黃檗版（鐵眼版）大藏經」，<sup>167</sup>然根據日本《上越教育大學所藏黃檗鐵眼版一切經目錄》的「解題」，說道：

寛文9年鐵眼拜謁於隱元（京都萬福寺）座下，表達出版大藏經心願。此時，隱元給予從明朝請來的一切經，然這不是隱元帶來，像是大阪的信徒勝性印在中國貿易中買取，之後贈送給隱元，隱元再授予鐵眼。此一切經稱萬曆版大藏經，其底本為永樂欽定的「北藏」勅版。萬曆版為普及版，亦稱作《嘉興藏》、楞嚴寺版、密藏本。<sup>168</sup>

隱元禪師送給鐵眼的嘉興正藏是日本商人勝性印所贈，非隱元禪師從中國境內帶來。野沢佳美亦述及，此《嘉興藏》實際是萬治元年（1658）貿易商海老屋四郎左衛門尉直重勝性印信徒所捐贈給隱元禪師的一部

<sup>165</sup> 大庭脩，〈第三章 書籍輸入の研究〉，《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頁 422-423。

<sup>166</sup> 釋鐵眼，〈刻大藏緣起疏〉，《鐵眼禪師遺錄》卷下，《黃檗鐵眼版一切經》，據日本昭和癸巳年（1953）黃檗山寶藏院刊本，頁 28 上。

<sup>167</sup> 高田祥平，〈六、黃檗高僧の來日〉，《東皐心越：徳川光圀が帰依した憂国の渡來僧》，東京：里文出版，2013 年，頁 58。

<sup>168</sup> 上越教育大學附屬圖書館編，《上越教育大學所藏黃檗鐵眼版一切經目錄》，新潟：上越教育大學附屬圖書館，1988 年，頁 196 下。

藏經（僅正藏）。<sup>169</sup>

此時中國商船載運《嘉興藏》作為商品販售至日本，為日本境內僧俗之所需。即「《嘉興藏》頻繁地運往日本，不只是作為諸寺院的寶藏，於江戶時代初期一輸入，便早已運用在各個方面」。<sup>170</sup>據野沢佳美等多方調查考證，萬曆《嘉興藏》刻本早已傳入日本，舉如天海版藏經中的《宗鏡錄》100 卷、《大方廣佛華嚴經》40 卷、《國清百卷》4 卷，這三種都是以《嘉興藏》本為底本。依此判斷天海版藏經編纂者天海是在日本正保 4、5 年（1647、1648）以前便獲得這三種佛典的《嘉興藏》本。《嘉興藏》本作為天海版底本之一，恐怕是經由長崎迅速取得《嘉興藏》輸入消息的天海版編纂者直接訂購以作為它的底本。

鐵眼版藏經，雖說鐵眼禪師以萬曆嘉興正藏為底本展開募化刻藏工作，始於日本寬文 9 年（1669，康熙 8 年），完成於日本天和元年（1682，康熙 21 年），前後歷時十三年。但野沢佳美等者日本學研究指出，鐵眼版不能單純說是《嘉興藏》的覆刻本。因為在鐵眼版中除街坊版本（書店刊本的和刻本）和標注訓點（漢字標示假名、標示讀音順序）的佛典、《嘉興藏》正藏以外的佛典外，還有《高麗藏》和明末單行本、朝鮮本等被當作底本加以利用。要言之，《嘉興藏》版本在日本坊間書店被覆刻成不同版本的和刻本，成為鐵眼刻藏時參考的底本之一，可見《嘉興藏》對於日本坊間刻書，及其帶給天海版和鐵眼版的影響非同小可，尤其是鐵眼版對日本佛典普及的貢獻極大，透過鐵眼版的普及，使得《嘉興藏》影響至近代。<sup>171</sup>

## II

<sup>169</sup> 野沢佳美，〈江戸時代における明版嘉興藏輸入の影響について〉，《立正大学東洋史論集》13，2001 年，頁 43。

<sup>170</sup> 野沢佳美，〈江戸時代における明版嘉興藏輸入の影響について〉，頁 41。

<sup>171</sup> 野沢佳美，〈江戸時代における明版嘉興藏輸入の影響について〉，頁 42-45。

此外，江戶時期《嘉興藏》輸入日本，亦為渡日明遺民、遺民僧的需求所致。像永曆 7 年（1653，日本承應二年，順治 10 年），浙江杭州仁和縣人戴笠，因明清鼎革渡日，隔年（1654）皈依隱元座下，為僧獨立性易。<sup>172</sup>在其〈乞緣大藏并及建閣言引〉談及嘉興《方冊藏》刊刻消息，說道：

會當我明嘉隆間，法運闌珊，幸出雲棲蓮大師，開導江漢，得啟吳會名公，咸親法味，知有道在。時荷當湖冢宰陸五臺先生，慨茲《龍藏》請頒匪易，敕制難從。遂與紫柏、憨山兩大師，創發書冊，流通天下，俾同《龍藏》經論錄外，附以代出禪宗語錄，合入藏函，垂光永永。板存杭郡徑山之兜率園，帙聚禾郡之楞嚴寺，大展法音，流布海宇，濟川市舶，以副覆載照臨之功，廣翼彌天之法運焉。<sup>173</sup>

此為僧獨立性易題於康熙 2 年，即日本寬文 3 年（1663）十一月一日之引文。身為江南士人的僧獨立性易，對明清之際嘉興刻藏消息，應有相當的掌握。而時在日曹洞宗諸老建議請藏並建藏閣，遂向僧獨立乞請藏募緣疏文。同文載言：

頃者，紫陽郡社洞宗諸老有事，請藏建閣之舉，猶言來乞鳩緣合勝之引，適余老病棲山，有聞喜豫，知不可謝。是一致其藏帙絲來，為邀高明樂施之成，將祝國運延禧之一助云。時 寬文三年，遂次癸卯復月朔日。<sup>174</sup>

■

<sup>172</sup> 木宮泰彥著，胡錫年譯，《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年，頁 685-686。

<sup>173</sup> 天閒野老獨立氏，〈乞緣大藏并及建閣言引〉，《天閒老人獨立性易全集》上冊，錄自禪文化研究所藏無著道忠抄稿之複寫本史料編號 189-446-3-10，臺北：臺大出版社，2015 年，頁 116。

<sup>174</sup> 天閒野老獨立氏，〈乞緣大藏并及建閣言引〉，《天閒老人獨立性易全集》上冊，頁 116-117。

由此可見，《嘉興藏》之海外流通，東亞海貿商品的買賣及明末清初渡日遺民、遺民僧的訊息傳遞和需求，均發揮促進之力。

然江戶時期，《嘉興藏》輸日集中在後期，期間乃因鄭成功反清勢力盤據臺灣沿海一帶，清於順康年間針對中國東南沿海頒布遷界令，禁止商船渡海，故唐船渡日受阻，《嘉興藏》輸日亦減緩。康熙 22 年（1683）鄭氏降清，翌年（1684）遷界令解除後，渡日唐船數量大幅增加，伴隨輸入的《嘉興藏》亦逐漸加多。<sup>175</sup>誠如前見大庭脩所舉的五部《嘉興藏》，都在此時期傳入，詳細書目於其編著，《舶載書目》中可以細查。<sup>176</sup>如享保乙亥 4 年（1719，康熙 58 年）〈改書籍〉，記錄此年度輸入日本的漢籍中有：

藏經。續八十七《函鐵壁禪師語錄》一部。又續二十七函《藥師直辨》一部。同冊函《法子肅禪師語錄》一部，同函《三壇傳戒縉門世譜》一部。同四十四函《美亭義》一部。已上五種□，正藏舊板同。<sup>177</sup>

## II

<sup>175</sup> 相關的討論，詳細可參考大庭脩編著，〈第一章 江戸時代における書籍輸入の概観〉，《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頁 22-24；浦廉一解說，〈唐船風說書の研究〉，《華夷變態解題》上，「唐船的意義」，收入林春勝、林信篤編，《東洋文庫叢刊》15，1981 年再版，頁 4-7；大庭脩，〈第二章 明清交代と幕府の対応〉，《徳川吉宗と康熙帝□ 鎖國下での日中交流》，東京：大修館書店，1999 年，頁 50-65；大庭脩，〈積荷の品々〉，《漂着船物語□ 江戸時代の日中交流》，頁 130-135；野沢佳美，〈江戸時代における明版嘉興藏の輸入状況について〉，《佛教學佛教史論集□ 佐佐木孝憲博士古稀記念論集》，東京：山喜房佛書林，2002 年，頁 167-169。

<sup>176</sup> 大庭脩編著，《舶載書目（宮内廳書陵部藏）》上下，京都：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72 年。

<sup>177</sup> 大庭脩編著，享保乙亥 4 年〈改書籍〉，《舶載書目》冊上，頁 34。

續藏。舊板九十函去戊戌板九十一函。當己亥歲九十三函。壬戌《歲毘尼止持會集》一部為又續四十三函。《毘尼作持續釋》為又續四十四函。當亥歲改加續藏故也。<sup>178</sup>

又續藏。舊板四十三函去戊戌歲板四十七函。當己亥歲板四十六函。舊板從《古梅州禪師語錄》以下至《天一悅禪師語錄》八部為四十三函。戊戌板《毘尼止持會集》為四十三函。《毘尼止持續釋》為四十四函。以舊板四十三函為四十五函。又空谷通隆禪師以下九部為四十六函。《吹萬禪師一貫別傳》以下九部為四十七函。其四十三函、四十四函、四十六函、四十七函四套戊戌板之新增也。當己亥板以戊戌板四十三函、四十四函加續藏以成四十五函。如田（旧）板為四十三函。以四十六函為四十四函、四十七函為四十五、為四十四函。新增《博山無異禪師廣錄》一部六本。《博山栗如禪師語錄》一部一本六卷，為四十六函。<sup>179</sup>

又續內新加三部。《五家宗旨纂要》一部一本三卷……《無異禪師唐（廣）錄》一部六十世五卷……《栗如漢禪師語類》一部一本六卷……。<sup>180</sup>

可見康熙晚期，嘉興正藏、續藏、又續藏的內容刊刻隨著現實的需求加以調整。而載運這些藏經的唐船，大庭脩據長崎市立博物館藏聖堂文書內的「享保四亥年書物改簿」，得見享保4年6月某日「第十二番南京船主李勝先花押」之唐船載有「一藏經壹簿，三百五拾乙套」；及同年9月某日「第二十一番南京船主鍾聖玉花押」之唐船載有「一藏經貳部，計七百貳套」的記載。<sup>181</sup>又《舶載書目》的享保9年（1724，雍正2年）

## ■

<sup>178</sup> 大庭脩編著，享保乙亥4年〈改書籍〉，《舶載書目》冊上，頁34-35。

<sup>179</sup> 大庭脩編著，享保乙亥4年〈改書籍〉，《舶載書目》冊上，頁35-36。

<sup>180</sup> 大庭脩編著，享保乙亥4年〈改書籍〉，《舶載書目》冊上，頁36-38。

<sup>181</sup> 大庭脩，〈第三章 書籍輸入の研究〉，《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頁421。

記錄「五番船」上載有「藏經」兩部，「九番船」載有「藏經」一部。<sup>182</sup>然同書中未見享保 20 年載有藏經二部之記錄。

同書於日本元文 5 年（1740，乾隆 5 年）記錄日本關西「興福寺寄進藏經之內續藏目錄」九十函，詳列〈續藏經值畫一〉，但未註明年代。對照康熙 16 年〈續藏經值畫一〉目錄，則乾隆年間輸入日本的嘉興續藏，不少函的內容受到更動，雖新加一些禪師語錄、戒本、經解和儀軌之類的佛書，但被剔除不少禪師語錄，詳細將另文進行比對，不逐一羅列於此。<sup>183</sup>顯然此與康、雍、乾的佛教統治及其文字獄施行不無相關。<sup>184</sup>

而寬保元年（1741，乾隆 6 年）記錄：「寬保元年持渡藏經目錄」。<sup>185</sup>附有馮夢禎書寫的〈經值畫一〉、〈刻藏緣起〉，總二一三套，對照康熙 16 年正藏 210 函，則目錄互有出入。「目終」處，關於經價，則題有：「二項共該紋銀一百拾陸兩參錢貳分玖厘。康熙參年奉憲重訂。新增諸方及本坊新刻經目附後」，為「又續藏目」錄，計三十六套。<sup>186</sup>大庭脩將此藏經目錄與《大明三藏聖經目錄》比較，則順序混亂、闕名經典多，因而判斷此經藏傳入恐不全。<sup>187</sup>

## ■

<sup>182</sup> 大庭脩編著，享保 9 年〈甲辰書籍控〉，《舶載書目》上，頁 74-75。

<sup>183</sup> 大庭脩編著，〈元文五年監閱書目〉，《舶載書目》下，頁 30-43。

<sup>184</sup> 王芳，〈『嘉興藏』と江戸時代□ 鳳潭『扶桑藏外現存目錄』を中心に〉，參考章宏偉、野沢佳美、廖肇亨、王蕾、韓錫鐸、釋法幢等相關研究指出：「《嘉興藏》的《續藏》與《又續藏》入藏書目的變遷與流通，與清的政治密切相連。」頁 68-69。

<sup>185</sup> 大庭脩編著，〈寬保元年持渡藏經目錄〉，《舶載書目》下，頁 1-73。

<sup>186</sup> 大庭脩編著，〈寬保元年持渡藏經目錄〉，《舶載書目》下，頁 63-64。

<sup>187</sup> 大庭脩編著，〈第三章 書籍輸入の研究〉，《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頁 425；章宏偉亦利用大庭脩編著，《舶載書目》（下）四十八，與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嘉興藏》函冊進行對照，並討論輸入日本的《嘉興藏》流傳概況，頁 49-56；其實日本相關研究頗多，建議章宏偉可以詳加參考，裨益究明。

乾隆年間，商船陸續載運《嘉興藏》販售至日本，據野沢佳美的調查統計，估算「《嘉興藏》通過江戶時代輸入 30 藏以上是確實的，若考量未確認案例，輸入件數載達 40 至 50 藏的可能性大。」<sup>188</sup>明治 18 年（1885，光緒 11 年）12 月刊，〈大日本校訂縮刻大藏經緣起〉記載嘉興方冊藏：

蓋全藏終功，不知在何歲也。辛苦勤勞，亦可想矣。爾來海內緇素得閱大藏，是密藏師之賜也。舶載於本邦頗多，鐵眼禪師所翻刻亦此本也。<sup>189</sup>

此時約當中國光緒年間，仍不知《嘉興藏》完刻於何時。談到「爾來海內緇素得閱大藏，是密藏師之賜也。」但同時也是受惠於「舶載」日本之《嘉興藏》頗多所致。所謂「爾來海內緇素得閱大藏」的「爾來」，若解其意，一則可解為明治時期日本僧俗能夠誦讀《嘉興藏》，是之前唐船舶載至日本為數頗多的關係。另則可理解成《嘉興藏》至明治時期，即清光緒年間仍是海貿中的流通商品，舶載至日本，遂使其海內緇素得以拜讀。若屬後者，則嘉興楞嚴寺經坊至光緒年間《嘉興藏》可能仍在刊印流通中。但是否如此，猶待究明。

在中國商船運輸藏經販售至海外途中，據朝鮮《肅宗大王實錄》卷 12，肅宗 7 年（1681，康熙 20 年）7 月 9 日條記載：

領議政金壽恒、左議政閔鼎重請對。壽恒曰：冊封奏請使，必當以大臣差送，今自上特以李正英差授。……時，中國商舶因大風，多漂到羅州、智島等處，而又有佛經縹帙甚新，佛器等物製造奇巧，漂泛海潮，連為全羅、忠清等道沿海諸鎮浦所拯得，通計千

■

<sup>188</sup> 野沢佳美，〈江戶時代における明版嘉興藏の輸入状況について〉，《佛教學佛教史論集Ⅱ 佐佐木孝憲博士古稀記念論集》，頁 165。

<sup>189</sup> 高楠順次郎編，〈大日本校訂縮刻大藏經緣起〉，《昭和法寶總目錄》冊 2，1967 年，頁 439 上。

餘卷。道臣連續啓聞，附上其書。上取覽，久不下。鼎重言：異端之書，不宜久留聖覽。壽恒亦言之，上乃命分賜南漢寺刹。<sup>190</sup>

漂流至朝鮮西南的羅州和智島之中國商船，船中載有佛經、佛教器具等，佛經多達千餘卷。按韓國學者研究，這些的經典乃《嘉興藏》佛書，目前收藏在首爾東國大學。然這艘前往日本的中國商船，因颶風而漂流至朝鮮西南沿海，遂使朝鮮出現《嘉興藏》流布，但在這之前或之後是否亦相繼販售至朝鮮，就目前研究所知有限，亟待究明。<sup>191</sup>

另外，明末清初的《嘉興藏》亦隨著商貿的腳步、明移民、遺民僧的南渡，傳入越南，深深影響越南的佛教。據研究，明末中越雙方「市舶貿易往來轉盛，粵籍人士赴越經商者日眾。」而明清之際，「永曆帝偏安兩粵，兵敗之後，官民南投越南者甚多。」此時嶺南與越南佛教的交流被視為高峰期。<sup>192</sup>諸如嶺南禪師于明亡之際相繼入越傳法，<sup>193</sup>自越

■

<sup>190</sup> 《肅宗大王實錄》，《朝鮮王朝實錄》，漢城：探求堂，1973年，卷12，肅宗7年（1681，康熙20年）7月9日條，頁542b。

<sup>191</sup> 이종수 (Lee, Jong-Su)，〈조선후기 가흥대장경의 復刻〉（朝鮮期嘉興大藏經的復刻），《書誌學研究》56，2013年，327-352；이미정 (Lee, Mi-Jeong)，〈명말 강남 사대부의佛學 유행과 『嘉興大藏經』開版〉（明末江南士大夫的復學流行與《嘉興大藏經》開版），《명청사연구》（明清史研究）42，2014年，頁65-99。

<sup>192</sup> 孫少飛，〈石濂大汕赴越南弘法探析□ 基于《海外紀事》的考察〉，《世界宗教文化》4，2017年，頁28。

<sup>193</sup> 如福建漳州府海澄縣人拙公和尚（1590-1644）與弟子明行禪師，及廣東元韶禪師（1648-1728）與其弟子福建同安縣紹安明海法師（1670-1746）、石濂大汕和尚（1633-1705）等的入越弘法。可參見譚志詞，〈十七、十八世紀嶺南與越南的佛教交流〉，《世界宗教研究》3，2007年；李貴民，〈嘉興藏對於越南佛教的影響〉，2017年10月20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演講；范文俊，〈閩南明海法寶禪師與越南南方佛教史〉，《泉州師範學院學報》33：5，2015年。相關的其他研究已陸續刊出，容不逐一贅述。

入粵求戒並取得相關戒律典籍回越者亦屢有所見，如性泉湛公（1674-1744）到廣東鼎湖山慶雲寺習禪，帶回佛教典籍，置於乾安寺（在今河內）。<sup>194</sup>而《嘉興藏》於越南重新覆刻流通等相關文獻記載，含經板等寶貴文化資產之新史料的挖掘，漸為學界所注意。舉例言之，《嘉興藏》《解惑編》經板，其題記：

是編也，鼎湖在和尚所集。……播於南國已有年矣。前經刊鐫印，板留京都乾安寺，至今尚存。……阮朝嗣德萬年歲拾貳歲在己未蓮月大暑。蓮池居士潘楚玩、張載道拜題。北寧省慈山府桂楊縣含龍寺住持僧法名通榮重刊，蒲山福田和尚裁訂。<sup>19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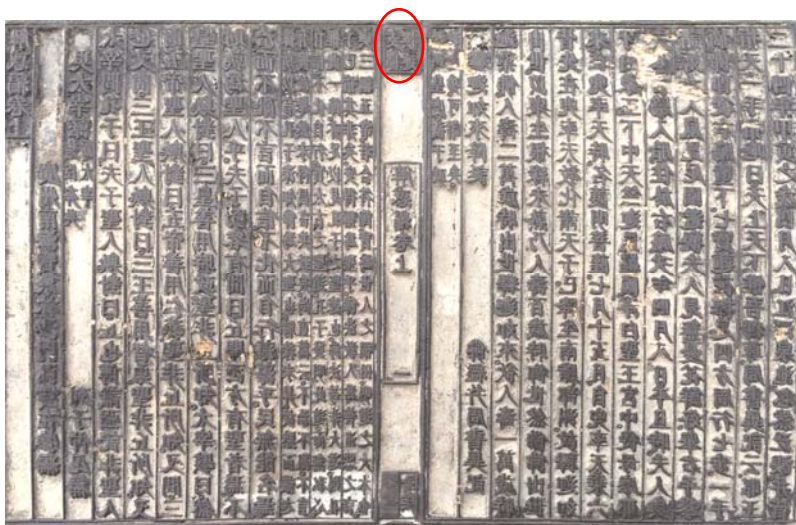
可見板刻樣式為明清江南《嘉興藏》刻版的再現，是越南《嘉興藏》覆刻本的重要例證（見圖十四）。在臺灣有李貴民博士從事越南《嘉興藏》相關文獻的蒐羅、調查和研究，誠屬難得。<sup>196</sup>

## II

<sup>194</sup> 相關可參考李貴民，〈嘉興藏在越南的流布概況□——以弘贊法師著作為例〉一文，發表於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主辦，「新絲路新思路 2016 年成功大學世界史學術會議」，2016 年 11 月 4 日。

<sup>195</sup> 河內漢喃社會科學院所藏，編號 AC. 598。

<sup>196</sup> 由於筆者多年關注晚明《嘉興藏》課題，在執行科技部補助「明末清初東南沿海佛教發展的歷史性轉折與地方家族變動的關係」多年期（三年）專題計畫（2013/8/1-2016/7/31）時，曾前往日本與越南進行相關的移地研究，進一步了解嘉興藏在東亞地區流傳的課題亟待著手探究，故於前述專題計畫結案後，緊接著申請科技部補助「明清之際《嘉興藏》有無完刻句點及其人物力動員與海內外流通」多年期（三年）專題計畫（2016/8/1-2019/7/31）。過程中，有鑑於李貴民博士的越南歷史研究專業，希望他能拓展對越南《嘉興藏》課題的關注，擴大視野。因此，李博士近一兩年來以博士後研究加入筆者的《嘉興藏》專題計畫，進行越南《嘉興藏》的探討，由於其個人的努力，取得不錯的成果表現。而本文所參引河內漢喃社會科學院所藏之佛典資料，乃由李貴民博士所提供，於此致謝，不再重複表注。



圖十四：越南《嘉興藏》本《解惑編》復刻經板

此《解惑編》經板，仿《嘉興藏》板，版心上端書口地方刻有「支那撰述」（圈圈標示處）。板藏於越南河內乾安寺。李貴民拍攝於2016年6月28日

再如收藏於河內漢喃社會科學院的鼎湖山沙門弘贊在慘（1611-1685）述，蒲山大覺禪寺度牒福田和尚臨濟派沙門安禪編，《毘尼日用》一卷，下註：「昔比丘錄是性泉祖師請得正本於大明國，將回本國，留于乾安寺，後海育禪師刊刻。」據內文記述：

授十戒和尚，諱如如，號徵徵。生於丙子年五月初五日酉時生。係大南國紹天府永福縣人，族姓鄭。於乙巳年五月二十一日，從安子山慧灯和尚受大戒。茲據北國祖師，係大南國建昌府武僊縣人。俗姓黃，生於丙子年六月二十七日戌時生。法名性泉，杜多和尚，於甲辰年五月初十日乙時，依救生如如和尚受沙彌戒。當時末法中衰，戒律已無聞矣。於乙卯年臘月初七日，奉旨恭詣于大明國端州廣東省鼎湖山慶雲大禪寺，頂禮其金光端和尚。六年

參扣，請得內外經典千萬餘卷，留在京都南同寨乾安寺，法寶流通，弘四分律。<sup>197</sup>

清楚記載，性泉法師自中國請得「內外經典千萬餘卷」，推測此為《嘉興藏》本。鼎湖山有經寮之設，雕印佛書語錄，入《嘉興藏》流通者不少。像弘贊的《四分律名義標釋》四十卷，末附刻一行：「康熙戊午（17年，1678）再治鼎湖經寮□梓入藏流通」。<sup>198</sup>其他類如《沙門日用》、《比丘尼受戒錄》、《式叉摩那尼戒本》、《禮舍利塔儀式一卷》、《歸戒要集》、《滄山警策句釋記》、《兜率龜鏡集》、《觀音慈林集》等弘贊編著佛書，縱非全是刊印於鼎湖山經寮，然均屬入藏流通著作，且大多被傳入越南。職是關係，加上前述各方請購《嘉興藏》普遍，僧性泉等欲請得《嘉興藏》攜回越南亦非難事。只是其請藏運輸路徑，當有別於蘇杭地區與日本之間的貿易交通管道，亦即越與粵自有其互為便利往來的區域性水陸交通要道。

從相關文獻來看，陸路從北越循廣西入廣東肇慶鼎湖山慶雲寺求法、求律，甚至輾轉求得嘉興楞嚴寺藏經刊本或覆刻本的可能性不低，因鼎湖山經寮覆刻《嘉興藏》本之佛典屢屢可見。對北越、湘廣一帶來說，鼎湖山或可說是佛典刊刻的重鎮之一。而位在廣州港埠周邊的海幢寺是另一處經典板藏、刊刻的要地，見中山大學圖書館藏《金剛直說》卷末題記：「乾隆三十七年壬辰正月望日謹誌，版藏海幢寺經坊」。<sup>199</sup>又筆者於2018年7月14日造訪海幢寺，獲該寺宏斌法師和堪忍法師的介

■

<sup>197</sup> 清·弘贊在彥述，越南·沙門安禪編，《毘尼日用》，河內漢喃社會科學院收藏，編號2345，1991年收錄。

<sup>198</sup>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釋家類·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頁575。

<sup>199</sup> 感謝中山大學圖書館李福標老師及哲學系張德偉老師的協助，讓筆者得以順利查閱該館所藏的《嘉興藏》刊本和相關文獻典籍。

紹，知悉該寺因歷經戰亂和政治的動盪，《嘉興藏》刊本已不復存在，法幢寺經坊亦消失無蹤。然該寺住持曾於拍賣市場購得該寺藏板刊刻的《重刻菜根譚》，題記：「霞漳溪邑張應振、澄邑謝孟苻同刊。嘉慶十五年歲次庚午浴佛日知契經次謹識。粵東海幢寺藏板，學院前聚賢堂刊。」由此可以想像，清代海幢寺經坊曾經有過的佛教書籍之覆刻、刊刻與流通的樣貌。其流通更可能借助廣州的海外貿易運送至越南的東京（河內）或會安一帶。從十九世紀中葉法人 T. Allom 繪製一幅位在江畔的海幢寺，外國人登岸入法幢寺遊覽的畫面中（見圖十五），或許可與佛教經典藉此路徑傳播至海外的想法做一合理的連結。



圖十五：1843 年廣州海幢寺外國旅客登岸游寺圖畫  
（筆者 2018/7/15 拍攝於廣東十三行博物館，右側為局部放大圖）

因此，遠離嘉興楞嚴寺的廣東即嶺南地區與越南的《嘉興藏》流通，其如何借助此區域內有利的人脈、商貿及水陸交通要件以克其功，自成有別於其他區域的經營模式。換言之，類似鼎湖山經寮、法幢寺經坊等嶺南地區重要的佛書印刷流通處，其對傳入越南《嘉興藏》有何影響。又《嘉興藏》藉由東亞海洋貿易輸入越南的管道為何？等，值得深究。而對於《嘉興藏》傳入越南及其影響的探討，是洞察十七、八世紀《嘉

興藏》於東亞漢傳佛教發展之深刻意義所不可或缺之一環。此議題將留待日後繼續予以關注和探討。

## 六、嘉興楞嚴寺與其藏板的消失

嘉興楞嚴寺自萬曆年間重建，至民國時期猶見身影，前後歷經三百多年且位在人聲鼎沸的鬧區，然曾幾何時竟消失於繁華勝地，且藏板一塊未留。其間的轉變，究竟為何，至今仍然不明。僧永賢的「寓秀水楞嚴寺聞復創之緣賦以志慨」一詩，是其請藏借宿楞嚴寺時所作。詩云：

昔人註經地，巨剎鎮市廛，歲久漸傾圯，化為金谷園。名葩每競艷，寶媛亦爭妍。引白消長晝，呼盧雜管絃。堂堂亞聖士，來訪舊楞嚴。觸目成長噫，悲驚夜不眠。……共思復侵地，結構紹前緣。……俄然成寶剎，恍如釋梵天。畫棟燦碧瓦，金殿垂珠簾。……仍鏤貝葉書，薄海頗爭傳。猗歟亦盛矣，庭燎難久炎。……我來遭病困，偃臥久留淹。<sup>200</sup>

重建復興後的楞嚴寺，仍位在市廛之中，金碧燦爛，莊嚴可見。如石韞玉所述：「楞嚴寺在闐闐囂塵之地，冠蓋輻輳而士女奔走也。」<sup>201</sup>商鋪林立、商貿發達的城區，有助於《嘉興藏》的流通，方便其請購、往來運輸。但時至今日，從網路資訊得知文革時期楞嚴寺結構已被徹底改造，「成為嘉興公安機關的駐地。」<sup>202</sup>舊貌已不復見，其位置在今日嘉興北門禾興路西側，與至今仍在的原精嚴講寺頗近。

■

<sup>200</sup> 清·釋永賢，「寓秀水楞嚴寺聞復創之緣賦以志慨」，《永覺元賢和尚廣錄》卷24，頁518下。

<sup>201</sup> 清·石韞玉，〈營泉寺記〉，《獨學廬·五稿》卷1，頁592b。

<sup>202</sup> 楞嚴寺，浙江省嘉興寺寺廟，<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5%9E%E4%B8%A5%E5%AF%BA/12503867>，2018/05/25。

筆者為了一探楞嚴寺遺跡並思索其消失之由，於 2017 年 7 月 18 日前往嘉興進行楞嚴寺遺址考察。自圖一可以清楚看到嘉興城區中，與楞嚴寺鄰近的有精嚴講寺名剎及城隍廟。因此訪查楞嚴寺舊址之前，筆者先尋覓精嚴講寺。多方探詢後，找到原精嚴講寺所在。<sup>203</sup>講寺位在精嚴寺街商業與住宅環繞地區（見圖十六、圖十七、圖十八），如是的发展已使講寺捲縮在狹隘巷弄之中，迫使大幅的寺地消失，也幾乎完全改變寺院舊有的容貌（見圖十九、圖二十、圖二十一）。



圖十六：今日精嚴寺街 圖十七：禾興南路寺街<sup>204</sup> 圖十八：昔日精嚴講寺街<sup>205</sup>

■

<sup>203</sup> 入寺後，受到住持吳品珍師兄（嘉興佛教協會常務理事）熱情接待，並為我一行人（筆者之外，有李貴民、韓復華、陳力麒等人同行）詳細解說精嚴講寺的今昔變遷與鄰近周邊的地貌關係。吳品珍師兄是位女性，但該寺均以師兄稱之。

<sup>204</sup> 圖十六、十七：嘉興禾興南路精嚴寺街商業區（2017/7/18 筆者攝）。

<sup>205</sup> 參取精嚴講寺誌編纂，《精嚴講寺志》，嘉興：精嚴講寺出版，2017 年，頁 45。



圖十九  
原精嚴講寺入口處  
(2017/7/18 筆者攝)



圖二十  
原精嚴講寺藏經閣弘一  
大師曾閱藏於此。<sup>206</sup>



圖二十一  
牆外電線旁矗立的高樓  
住宅原是精嚴寺藏經閣  
(2017/7/18 筆者攝)

據載：

清代中葉以來，寺屋、寺產相繼被占用。咸豐年間，太平軍占領嘉興后，進駐精嚴講寺，寺宇被拆，成為貯藏金銀財務軍糧之「聖庫」。……清末民國年間，戰爭頻仍，寺宇逐漸改為民居，寺產也無從落實。<sup>207</sup>

又：

解放初尚保留完整。一九五六年，定為三級文物保護單位。后改為列軍屬制本廠，殿宇漸為現代化廠房所替代。一九九四年，開發商品住宅，又拆除藏經閣、禪堂及寮房。<sup>208</sup>

■

<sup>206</sup> 參取幼甫修，陸志鴻等纂，《嘉興新志》。

<sup>207</sup> 精嚴講寺志編纂，〈第五 僧團〉，《精嚴講寺志》，2017年，頁96。

<sup>208</sup> 精嚴講寺志編纂，〈第八 藝文〉，《精嚴講寺志》，頁130。

由於精嚴講寺在市區發展受限，故「兩次移址，今天的精嚴講寺坐落在嘉興市七星街道湘家蕩東側」，<sup>209</sup>重建的新精嚴講寺是一座莊嚴宏偉的寺宇（見圖二十二）。



圖二十二：新精嚴講寺  
（2017/7/18 筆者攝）

同樣位在嘉興市中心的楞嚴寺，其沒落，似乎也可以從精嚴講寺的興衰跌宕中找到能夠理解的共同因素。

舊精嚴講寺吳品珍師兄，帶領我們前往楞嚴寺舊址。沿著精嚴寺街走去，不遠處便進入楞嚴寺遺址，如今已成南湖區公安分局駐地，寺院格局蕩然，只能透過遺跡和銀杏樹想像往日嘉興楞嚴寺經坊刊印流通《嘉興藏》和頻繁來寺請藏僧俗的活絡景象（見圖二十三、圖二十四、

■

<sup>209</sup> 精嚴講寺誌編纂，〈序〉，《精嚴講寺志》，頁2。

圖二十五、圖二十六)。過去是商貿發達，人群往來頻繁的市區，今日仍見其熱鬧景象，對於藏經的流通確實提供方便之利。然七月暑熱之氣，高達 40 度氣溫，其難耐程度，讓筆者深深體會僧永賢前來嘉興楞嚴寺請藏時，「以暑毒抱病甚劇」的感受及其真實性。



圖二十三：楞嚴寺正殿舊照<sup>210</sup>



圖二十四：楞嚴寺舊址<sup>211</sup>



圖二十五：楞嚴寺舊址<sup>212</sup>



圖二十六：楞嚴寺舊址旁<sup>213</sup>

■

<sup>210</sup> 參取幼甫修，陸志鴻等纂，《嘉興新志》。

<sup>211</sup> 昔日正殿位置，今為南湖區公安分局，2017/7/18 筆者攝。

<sup>212</sup> 可能是經坊和其他殿閣，昔日正殿後矗立兩顆銀杏樹，2017/7/18 筆者攝。

<sup>213</sup> 城隍舊址，2017/7/18 筆者攝。

楞嚴寺舊址絲毫未留下刻藏的任何足跡與身影，可說全然不存，令人不勝唏噓。其發展與今日新精嚴講寺大不相同，故未能再現其往日流通經藏的風華。但由於兩寺的依傍，故借助精嚴講寺重建的史蹟，多少留下有關楞嚴寺過往刻藏記憶的隻言片語。像《精嚴講寺志》提到康熙 44 年（1705）賜「藏海慈波」匾額給楞嚴寺。「由嘉興楞嚴寺集中經版印刷后，開始在精嚴講寺發行流通」。<sup>214</sup>此訊息若屬實，則寂照庵、化城寺與楞嚴寺三寺擔任嘉興刻藏的角色及相互之間的關係，已逐漸為楞嚴寺和精嚴寺的刊印流通關係所取代。究竟確切詳情為何，仍待更多史料的挖掘。不過，兩寺緊密的關係由此可見端倪。又如 1950 年代，董巽觀（1897-1970）與庄一拂同時整理精嚴寺藏經閣的大藏經時，發現：

在藏經的大櫥櫃中，發現梵夾式書寫經本七八十折，以及《大藏經》（涵芬樓影印版）、《續藏經》（日本版）和《金陵刻經處》的許多經卷。其中大多是根據楞嚴寺般若堂本重刊的。他們把所有的經書分門別類地整理，現收藏于嘉興博物館。<sup>215</sup>

而 1963 年住持精嚴寺的修正法師，任期間曾將鎮寺之寶的「楞嚴寺著名紫柏大師銅像等 236 件佛教文物」，<sup>216</sup>捐贈給嘉興博物館（見圖二十七）。新精嚴寺文物館現藏紫柏大師銅像（見圖二十八）。

## II

<sup>214</sup> 精嚴講寺誌編纂，〈第七章 法寶・嘉興藏〉，《精嚴講寺志》，頁 108。

<sup>215</sup> 精嚴講寺誌編纂，〈第四章 人物・董巽觀〉，《精嚴講寺志》，頁 78。

<sup>216</sup> 精嚴講寺誌編纂，〈第四章 人物・修正〉，《精嚴講寺志》，頁 75。



圖二十七：紫柏大師銅像<sup>217</sup>



圖二十八：紫柏大師銅像<sup>218</sup>

基於精嚴寺代為收藏楞嚴寺諸多的貴重文物，可見兩寺關係之密。也因為如此，精嚴寺有鑑於過往《嘉興藏》刊刻流通是楞嚴寺存在的重責大任，保有《嘉興藏》方足以彰顯楞嚴寺在過去《方冊藏》刊印流通史上的重要地位。1999年起，中國進行《嘉興藏》的發掘與整理，重輯全藏 380 函，總 12000 卷，含「正藏、續藏、又續藏及未入藏」，共影印 685 部。故精嚴寺於 2008 年 11 月 10 日「舉辦《嘉興藏》三百年重歸故里圓成法會」，「并恭請《嘉興藏》一部，藏於寺中。」<sup>219</sup>

II

<sup>217</sup> 紫柏大師銅像，刊於嘉興博物館，「典藏精選」欄，[http://www.jiaxingmuseum.com/content/2014-11/24/content\\_2562683.htm](http://www.jiaxingmuseum.com/content/2014-11/24/content_2562683.htm)，2014/11/24。這尊銅像原藏嘉興楞嚴寺，1963 年由精嚴寺主持修正捐藏，才得以保存，如今這尊銅像已成為稀世孤品。

<sup>218</sup> 新精嚴寺文物館藏，2017/7/18 筆者攝。

<sup>219</sup> 精嚴講寺誌編纂，〈第四章 人物・修正〉，《精嚴講寺志》，頁 108-109。

因此若欲深入了解嘉興楞嚴寺在中國近現代的發展與遭遇，除了持續挖掘相關材料，及嘉興博物館所藏楞嚴寺文物之研究外，訪談紀錄猶待努力。

## 七、結語

嘉興楞嚴寺自萬曆年間興復以來，歷經三四百年的《嘉興藏》刊印流通之責，因人事的跌宕、營運管理的瑕疵、後繼無妥適之人與政局的變動，致使刻藏過程衍生諸多變異，影響其補刻和完刻之舉，甚至全藏不知終了於何時。當中眾多刻場的並存，之間的競合紛擾，亦是原因之一。自紫柏離世後，凝聚各方施刻資金之力衰微，故「四方有道力者，隨討未刻名目，同式就梓。」<sup>220</sup>加上入藏標準趨於寬鬆，又藍吉富稱：「本版書與外版書的覆刻本等越到後期，題記越趨於簡略」，「可見時代愈早，附載欄愈詳備。時代愈晚，則愈趨簡略。」<sup>221</sup>這讓《嘉興藏》欠缺完整與統一的形式，致使隨意性特質益趨明顯。

嘉興楞嚴寺在進入刻藏晚期，尤其是順、康年間，不管在藏板貯存、刊刻、流通等方面，越顯其重要性。而四方前來附板入藏，求其流通或求得版本認可的需求，亦越加顯著，儼然成為刻印並流通《嘉興藏》的中心，具有不可撼動的地位。雖然如此，楞嚴寺對於全藏的刊行與掌管，終究仍難克盡所能，欠缺統整之力。民間私刻，集資不易、人才不繼等是其執行刊刻上的一大困難與障礙。而經板散處各地，久久未能統一，續藏、又續藏隨時隨處增刻，入藏或各地刻版附藏流通之佛書、語錄亦極為多元。不管是單行本或複合本，板留嘉興楞嚴寺予以刊印流通，即

<sup>220</sup> 清·釋正印重編，〈刻方冊藏經目錄序〉，《紫竹林顯愚衡和尚語錄》卷7，頁695b。

<sup>221</sup> 藍吉富，〈《嘉興藏》研究〉，刊於《台北版電子佛典集成》，「相關知識」欄，「五、刊刻經過及人事更迭」，<http://taipei3.cbeta.org/jiaxing.php>，2018/8/28。

可視為《嘉興藏》板佛書，但楞嚴寺卻未能對此多元不一的樣式發揮實質的管控和統合。如此不僅顯示楞嚴寺無法掌握刻藏的全貌，同時也反映《嘉興藏》實質是一部龐大雜多且難窺全貌之藏經。

儘管楞嚴寺在《嘉興藏》的流通與管理出現上述的瑕疵，然《嘉興藏》流通之廣遠超乎想像，請藏是推廣的重要媒介。除寺院外，可以是商人、出版家、刻書家、藏書家<sup>222</sup>和信眾等進行請購和收藏，蔚為風潮。同時透過嘉興所在的印刷出版業及地理位置的優勢，以及十七、八世紀東亞海洋貿易路徑，致使其海內外的流通更廣，影響更深。這確實是楞嚴寺在嘉興刻藏史上難以為人所抹滅或忽視的重要歷史成績，也實踐紫柏當初為發行流通方冊藏而重振楞嚴寺的本懷。

當然本文對於明清時期嘉興楞嚴寺，尤其是清中葉以後的發展歷程，含其經營的衰退與消失等仍存在諸多不明之處。但未來若能透過文獻與踏查口訪的更多發掘、再行探究，則楞嚴寺與《嘉興藏》所共同承載的發展生命史，及其與中國內外之社會、經濟、海貿與政治等十七、八世紀的東亞情勢之相繫相伴的關係，勢必可以獲得更清晰的勾勒。同時對於楞嚴寺《嘉興藏》的刊刻與流通是否有助於十七、八世紀以來東亞佛教文化再興的此一命題，亦將提供有利的觀察。而這也是筆者未來希望持續戮力的課題。

■

<sup>222</sup> 陳心蓉，〈第二章 明代興盛的嘉興藏書 第三節 明代嘉興官府及佛寺藏書〉，《嘉興藏書史》，頁 20-74。

## 引用書目

### 佛教典籍與古籍

- 《佛說盂蘭盆經疏》，《嘉興大藏經》冊 5，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
- 《金剛經如是解》，《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19，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
- 《憨山老人年譜自敘實錄疏》，《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22，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
- 《布水臺集》，《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26，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
-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28，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
- 《山暉禪師語錄》，《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29，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
- 《知空蘊禪師語錄》，《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37，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
- 《丹霞澹歸禪師語錄》，《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38，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
- 《永覺元賢和尚廣錄》，《叀新纂大日本續藏經》冊 72，台北：白馬寺印經會，出版年代不詳。
- 《淨土聖賢錄續編》，《叀新纂大日本續藏經》冊 78，台北：白馬寺印經會，出版年代不詳。
- 《釋靈峰蕩益大師宗論》，《徑山藏》冊 190，北京：國家圖書館，2016。
- 《光緒嘉興府志》，清·許瑤光重輯，清·吳仰賢等纂，上海：上海書店出版，1993。
- 《有學集》，清·錢謙益，《續修四庫全書》冊 139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朱竹垞先生年譜》，清·楊謙，《清初名儒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2006。
- 《快雪堂集》，明·馮夢禎，《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164，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 《快雪堂日記》，明·馮夢禎，《稀見明史史籍輯存》，北京：線裝書局，2003。
- 《定盦續集》，清·龔自珍，《四部備要·集部》函 191，台北：新陸，1963。
- 《明詩綜》，清·朱彝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牧齋初學集》，清·錢謙益，《四庫禁燬叢刊·集部》冊 114，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南明野史》，清·南沙三，《中國野史集成》冊 35，成都：巴蜀書社，1993。

- 《客商一覽醒迷天下水陸路程》，明·黃汴纂，據崇禎 8 年 9 月刊本，日本山口大學圖書館藏影印。
- 《毘尼日用》，清·釋弘贊述，越南·沙門安禪編，河內漢喃社會科學院收藏，編號 2345，1991。
- 《海雲禪藻集》，清·徐作霖等編，黃國聲點校，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2017。
- 《康熙嘉興府志》，清·袁國梓纂修，《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冊 15，北京：中國書店，1992。
- 《徧行堂集》，明·釋今釋，《禪門逸書》冊 12，清光緒間釋惟心鈔本，台北：宗青圖書出版社，2000。
- 《徧行堂續集》，明·釋今釋，《禪門逸書》冊 14，清光緒間釋惟心鈔本，台北：宗青圖書出版社，2000。
- 《肅宗大王實錄》，《朝鮮王朝實錄》，漢城：探求堂，1973。
- 《嘉慶餘杭縣誌》，清·張吉安修，清·朱文藻等纂，據民國八年重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
- 《嘉興府志》，明·劉應鈞修，沈堯中等纂，據萬曆 28 年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 《嘉興新志》，1970，幼甫修，陸志鴻等纂，臺北：成文出版社。
- 《獨學廬》初稿至五稿，清·石韞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錢牧齋先生尺牘》，清·錢謙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
- 《隨緣集》，清·釋靈耀，《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橋李詩繫》，明·沈季友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 《雞足山寺志》，明·錢邦纂；清·范承勳增修，《中國佛寺志》第 3 輯第 2 冊，台北：丹青圖書出版，1985。
- 《鐵眼禪師遺錄》，釋鐵眼，《黃檗鐵眼版一切經》，日本昭和癸巳年（1953）黃檗山寶藏院刊本。

## 現代專書、論文

- 《徑山藏》編委會編，2016，《徑山藏目錄》，北京：國家圖書館。
- 上越教育大學附屬圖書館編，1988，《上越教育大學所藏黃檗鐵眼版一切經目錄》，新潟：上越教育大學附屬圖書館。

- 大庭脩，1972，《舶載書目（宮内廳書陵部藏）》，京都：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出版。
- 大庭脩，1986，《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京都：同朋社。
- 大庭脩，1999，《徳川吉宗と康熙帝□ 鎖國下での日中交流》，東京：大修館書店。
- 大庭脩，2001，《漂着船物語□ 江戸時代の日中交流》，東京：岩波書店。
- 木宮泰彦著，胡錫年譯，1980，《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務印書館。
- 王芳，2016，〈『嘉興藏』と江戸時代□ 鳳潭『扶桑藏外現存目錄』を中心に〉，《インド哲學佛教學研究》24，頁 63-85。
- 吳天任，1989，《澹歸禪師年譜》，香港：香港志蓮圖書館等助印，線裝本，丹霞別傳寺藏。
- 李貴民，2016.11.4，〈嘉興藏在越南的流布概況□ 以弘贊法師著作為例〉，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主辦，「新絲路新思路 2016 年成功大學世界史學術會議」。
- 李貴民，2017.10.20，〈嘉興藏對於越南佛教的影響〉，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演講。
- 范文俊，2015，〈閩南明海法寶禪師與越南南方佛教史〉，《泉州師範學院學報》33：5，頁 11-15。
- 孫少飛，2017，〈石濂大汕赴越南弘法探析□ 基于《海外紀事》的考察〉，《世界宗教文化》4，頁 28-34。
- 徐興慶編著，2015，《天間老人獨立性易全集》，錄自禪文化研究所藏無著道忠抄稿之複寫本史料編號 189-446-3-10，臺北：臺大出版社。
- 浦廉一解說，1981，《華夷變態解題》，收入林春勝、林信篤編，《東洋文庫叢刊》15，東京：東洋文庫刊，頁 4-7。
- 高田祥平，2013，《東皐心越：徳川光圀が帰依した憂国の渡来僧》，東京：里文出版。
- 高楠順次郎編，1967，《昭和法寶總目錄》，台北：建康書局。
-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輯，1966，《明人傳記資料索引》，台北：中央圖書館。
-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2000，《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臺北：國家圖書館。
- 章宏偉，2011，〈《嘉興藏》的刊刻及其在日本的流播〉，《古代文明》5：4，頁 45-58。
- 章宏偉，2018，〈清前期的江南書市與長崎貿易〉，收入《明清江南經濟發展與

- 社會變遷》，復旦史學輯刊第六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頁 306-328。
- 野沢佳美，2001，〈江戸時代における明版嘉興藏輸入の影響について〉，《立正大学東洋史論集》13，頁 40-55。
- 野沢佳美，2002，〈江戸時代における明版嘉興藏の輸入状況について〉，《佛教學佛教史論集□ 佐佐木孝憲博士古稀記念論集》，東京：山喜房佛書林，頁 157-170。
- 陳心蓉，2010，《嘉興藏書史》，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 陳玉女，2010，《明代佛門內外僧俗交涉的場域》，臺北：稻鄉出版社。
- 陳玉女，2011，〈晚明羅教和佛教勢力的相依與對峙□ 以《五部六冊》和《嘉興藏》刊刻為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40，頁 93-123。
- 陳玉女，2018，〈明末清初嘉興藏刊刻與江南士族〉，《佛光學報》新 4:2，頁 301-372。
- 陳垣，2009，《明季滇黔佛教考》，收入陳垣著，陳智超主編，《陳垣全集》冊 18，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
- 無名氏編，1978，《嘉興藏目錄》，據民國 9 年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
- 楊玉良，1997，〈故宮博物院藏《嘉興藏》初探〉，《故宮博物院院刊》，頁 13-24。
- 楊維中，2017，〈幽溪傳燈嫡孫天溪受登行曆考述□ 明清時期天臺宗「桐溪法系」考述之二〉，《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5，頁 94-98。
- 精嚴講寺誌編纂，2017，《精嚴講寺志》，嘉興：精嚴講寺出版。
- 謝磬后（釋法幢），2017，《法寶流通：《徑山藏》的文獻價值與文化傳播影響》，北京：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學位論文。
- 韓錫鐸，2009，〈我所了解的《嘉興藏》〉，收入中國佛教協會等主辦，《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論文集》，宜蘭：佛光大學，頁 279-284。
- 譚志詞，2007，〈十七、十八世紀嶺南與越南的佛教交流〉，《世界宗教研究》3，頁 42-52。
- 이미정 (Lee, Mi-Jeong)，2014，〈명말 강남 사대부의 佛學 유행과『嘉興大藏經』開版〉（明末江南士大夫的復學流行與《嘉興大藏經》開版），《명청사연구》（明清史研究）42，頁 65-99。
- 이종수 (Lee, Jong-Su)，2013，〈조선후기 가흥대장경의 復刻〉（朝鮮期嘉興大藏經的復刻），《書誌學研究》56，頁 327-352。

### 網路資源

紫柏大師銅像，嘉興博物館，[http://www.jiaxingmuseum.com/content/2014-11/24/content\\_2562683.htm](http://www.jiaxingmuseum.com/content/2014-11/24/content_2562683.htm)，2014/11/24。

藍吉富，〈《嘉興藏》研究〉，刊於《臺北版電子佛典集成》，「相關知識」欄，「五、刊刻經過及人事更迭」，<http://taipei3.cbeta.org/jiaxing.php>，2018/08/28。

楞嚴寺，浙江省嘉興寺寺廟，<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5%9E%E4%B8%A5%E5%AF%BA/12503867>，2018/05/25。

